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學士班學生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achelor's Thesis



遣使入覲：清代朝覲制度研究再析

Send Envoys to Meet the Emperor:

Re-analysis of Envoy Kowtow Ritual System in Qing China

陳冠傑

Kuan-Chieh Chen

指導教授：甘懷真 博士

Advisor: Huai-Chen Kan, Ph.D.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April 2024

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遣使入覲：清代朝覲制度研究再析

Send Envoys to Meet the Emperor:
Re-analysis of Envoy Kowtow Ritual System in Qing China

本論文係陳冠傑君(B09103061)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完成之學士班學生論文，於民國 113 年 4 月 17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3 位)：

甘麗貞

(簽名)

(指導教授)

長谷川正人

孔令偉

系主任：

陳慧宏

(簽名)

摘要

本論文旨在從天下政體的視野，審視作為歷史中國之清王朝在對外關係中，尤其是面對內陸亞洲政團時，如何進行禮儀的實踐及探究其背後的歷史意義。為此，筆者從體現君臣、主奴或主僕關係的朝覲禮儀制度作為切入點，並分別從滿、漢文的朝覲概念演變，以及與哈薩克諸部等內亞政團互動，此兩面向深入分析清代朝覲制度的概念與制度運作。

首先，分析滿、漢文中關於朝覲概念，並將「叩頭」與「朝覲」在滿文使用上的語意變化，視為清乾隆年間新清語運動下的產物，尤其體現在原本用來對譯朝覲的滿文詞彙「叩頭」(hengkilembi)，逐漸被乾隆朝發明的新詞彙「朝」(hargāšan)所取代。這類用語上的改變，也出現在清朝與左部哈薩克諸部互動的滿文文書之中。

再者，則是利用滿文檔案梳理清朝與左部哈薩克建立關係的史實發展，以天下政體的角度探討清哈之間，如何透過朝覲制度成為清朝的外藩。並進一步指出在清朝歷史書寫中，有意選取使得雙邊關係建立聯繫之檔案，從而使得左部哈薩克阿布賚汗王「遣使入覲」，得以納入天下體制的話語當中。最終，再透過分析哈薩克朝覲清朝的案例，再思天下政體學說的意義。

關鍵字：朝覲、叩頭、哈薩克、天下制度、新清語運動、禮儀研究

論文目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摘要	ii
論文目次	iii
圖表目次	v
敘傳	vi
一、前言.....	1
從費正清到「新清史」視野下中國的世界秩序.....	3
如何理解清代禮儀？	5
理藩院、藩部與內陸亞洲	8
清朝與哈薩克諸部的關係	9
二、何謂朝覲？從以清代辭書中的政治概念談起	12
歷史中國的「朝覲」語境	13
清代語境下的朝覲	14
滿文語境下的朝覲	15
官方滿語的朝覲概念	17
小結：清代朝覲的概念	22

三、遣使入覲：乾隆年間哈薩克諸部使節來朝	23
平準餘波：清朝與哈薩克關係之建立	24
清朝對哈薩克汗諸部的認識	25
清朝與哈薩克諸部朝覲往來始末	26
左部哈薩克汗王阿布賚遣使入覲始末	29
四、哈薩克諸部的朝覲禮儀實踐	36
哈薩克諸部汗王子弟入覲	36
入覲序班的身體與落在會典的筆	39
五、結論：以朝覲制度再思天下	42
附錄.....	44
附錄一、〈參贊大臣富德奏聞與阿布賚商定輪班覲見情形摺〉翻譯	44
附錄二、乾隆年間哈薩克諸王公遣使入覲表（1757年至1795年）	49
參考文獻.....	52
跋	59



圖表目次

表一、武英殿本《御製康熙字典》中關於朝覲字義表	15
表二、清宮清文鑑禮儀詞彙收錄分類.....	22
圖一、左部哈薩克首次遣使入覲時序示意圖.....	29
表三、乾隆年間哈薩克諸王公遣使入覲表（1757年至1795年）*.....	49



敘傳

這篇論文想要回應的議題，其實可以追溯到近兩年前的壬寅年秋。那時我正在幫忙近史所馬騰(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副研究員，找尋明清會典中關於朝覲、朝賀、外官常朝儀等相關史料。雖然當時翻閱正德、萬曆、康熙、雍正、乾隆朝的會典史料，但對於這些材料該如何詮釋與理解，卻缺乏更為深入的理解。

而在經歷甘懷真老師在臺大開設的中國政治制度史，以及閱讀克禮那本清初禮部建立的專書後，便有了想從天下政體移轉的角度，探討與禮儀相關的題目，並以之申請報名該年的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當時的我幾乎是每隔幾週都在課堂結束後，向請益甘老師我研究題目的一些想法，不論是從原先探討清代禮樂制度，如由康熙朝至乾隆朝的《御製律呂正義》及其《後編》所反映的音樂觀念變化與天下制度之間的關聯；還是探討清入關前的堂子祭祀禮儀下，反應的禮儀建構與政治關係。最後再到以明清會典史料探討清代朝覲禮儀的初步想法，最終便以〈朝覲往來：清代朝覲制度研究〉為題申請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

癸卯年，黑兔年，真的就像一隻小兔子，四處東奔西跑，回首一看歷經了很多事情。而與這篇文章較有關連的部分，那就是下半年的我得知這份研究計畫申請補助成功，再加上我個人的學業安排，使得我當時是一方面找史料撰寫這篇論文，一方面又要準備歷史系的碩士推甄考試，另一方面還要處理工作與學業等各項事務，也就是說那段時間的我，基本上是在多線勞形於案牘，當然，其中也有不少插曲。不論是從宋家復老師那邊學習並意識到究竟該如何閱讀與學習歷史的方法，還是正逢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來近史所訪問，促使我進一步閱讀她那本關於馬戛爾尼使團覲見過程中的翻譯者的專書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並且留下想在將來碩士論文的撰寫中，解決前人較少以系統性分析清代翻譯機構的問題，及其在天下秩序與禮儀脈絡之下明清易代後的演變與差異。

當然，回到我個人試圖將每件事情一碗水端平的過程中，也有很多師長與幾位好友能夠在各種層面提供協助。不論是我大學四年的清文啟蒙老師林士鈺教授，一直以來提供論文與研究計畫的意見。說來很巧，前些日子整理電腦中的檔案，發現我初學滿文時的期末滿文翻譯考題之一，正是我在本篇論文中引用康熙實錄滿文版；還是那時已在美國加州的馬騰老師，針對推甄計畫提出可參考的海外漢學界專書與論文；抑或是近史所的賴毓芝教授針對研究計畫與論文提出一些具有啟發觀點，以及提供給我能夠使用民間滿文辭書與清代會典的機會；還有我另一位滿文老師莊吉發老師，贈與他譯校的《滿漢異域錄》史料與歷朝會典的研究方向；又或是甘老師在其中提供各種協助與在論文撰寫上的意見，即便清史並非他所擅長領域，但他總能從歷史中國發展的大脈絡中，針對我的疑問提出很多具有啟發性的意見，其中禮儀與經典詮釋方面的討論，則對我的研究大有助益。

而在幾位好友方面，像是王安珩、柯采元、陳昱碩等同學願意找我組成考研小組，一同面對推甄考試與探討相關議題；或是劉洺辰學棣從圖書資訊的專業，指出原先論文文稿當中許多註釋的疏失。還有來自各地的朋友，像是現於遠方的南開大學，此時即將前往瑞士就讀日內瓦高等學院的學姊張冉，與我分享一些外交史研究理路。我原先的研究計畫並不打算往這方面前進，但在她的影響下，我略為修改原先思考的路數，將思考放在清哈之間的國際關係上；或是熬過七年之癢的元老級朋友吳達諾，在師大時期認識的老朋友及時雨李雨桐，以及自壬寅年夏天以來至今，一直願意陪我讀書的王婷儀。他們總能各自在我個人能量快要耗盡的時候，帶給我歡笑或是有意思的靈感。總而言之，隨著碩士推甄放榜，成功考進臺灣大學歷史所，還有日以繼夜地持續撰寫本文在國科會案子中的原型前身。

總之，站在歲末時刻的我，再回望癸卯年這隻躁動的黑兔所帶來各式各樣挑戰，真令人感到——只教是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隨著這篇論文撰寫成爲我這幾個月來的日課。甲辰，這條遊龍轉瞬間便邁入五月，這段時間如同連珠般，我歷經國科會交稿、學士論文完稿、學士論文口試、準備投稿校內學士論文獎等等；同時，年初物理所外附近籬笆上那幕炮仗花，已漸次在四月底被這一簇簇疏華菊取代，唯一不變的是那綠葉透露出的金黃。而且距離民族所前阿勃勒盛開的季節也不遠了。

在這篇敘傳的壓軸，其實也是謝辭，我想由衷感謝甘懷真老師對於本篇研究從構思到論文口試的過程中，提供莫大的幫助；感謝口試委員孔令偉老師與長谷川正人老師，在口試答辯時，針對我研究上的盲點，提出有效的問題及十分受用的建議。像是長谷川老師從朝貢制度的相關研究，回應我研究中缺乏西洋諸國的案例，還是提醒我經常忽略理藩院在清代對外關係中所扮演角色的問題等。或是孔老師從國外相關議題學術史的角度，指出我的研究缺少討論哪些與之相關的學說史，尤其是強調我應該參考蘇聯與哈薩克史學界對於朝覲制度的研究，才不會囿於中原或清帝國的視角，並提醒論文架構該如何修改較爲合適。還有甘老師強調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性，而這點也讓我意識我習於概念先行的探討，從而忽略掉實際的制度運作本身，使這篇研究在試圖建立已說時，或略顯單薄。此外，還要感謝臺大歷史系的林佳宜助教，在我撰寫、繳交論文、評選論文獎時所提供的各項幫助。

而在敘傳的尾聲，我想要謝謝李雨桐學姊、胡詩琪學姊等人在論文寫作中提供的各種層面的幫助。其中也包含當時熬夜趕工的詩琪，在五點時來電把差點睡過頭，並且來不及繼續弄簡報的我叫醒，如果沒有她的提醒，我可能會無法順利把論文口考準備完成。同時，也感謝王婷儀願意在這篇論文撰寫的緊要關頭，陪我走完這最後一哩路，在此再次感謝她。

甲辰年三月廿五 雨 陳冠傑 於臺大文學院

一、前言*

近年來東亞王權研究，基本上基於「中國」與「天下」這兩個關鍵詞開展討論。¹ 所謂「天下」，即天之下、普天之下，是源於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強調以周天子位居天下之中心，四裔諸侯皆為周天子的臣屬，用以屏障周王室。² 在漢代獨尊儒術後，天下制度成為歷史中國的主流學說，與之相伴的君臣之分、華夷之辨、天下秩序等觀念，成為日後中國政治的思想資源，不過需指出古人的「天下」語境，並非描述客觀空間，而是政治體的概念。³

歷史中國該如何在對外關係中實踐思想資源，則能從朝貢制度的角度談起。上世紀 60 年代末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以當時對於清朝及其藩屬國的研究，提出的「中華世界秩序」的初步構想，並將清代的朝貢制度（Tribute System）視為中國古代的政治秩序傳統。⁴ 費正清提出的朝貢體制論在國際學界產生各種迴響，⁵ 諸如前現代的東亞世界有沒有國際關係？或源自於中國中心主義的朝貢體系是否具有有效性？或是論及通商、互市與邊關交涉等實際制度的研究，強調中國對外關係在實務上的複雜情況。⁶

* 本篇學士論文的部分章節，修改自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朝覲往來：清代朝覲制度研究」（112-2813-C-002-043-H）的研究成果。另經口試委員與指導老師建議，以及筆者依據本文討論的對象，或可重新擬定題目為〈遣使入覲：清代乾隆朝哈薩克諸部朝覲研究〉（Send Envoys on a Pilgrimage to the Emperor: A Study of the Kazak Hordes' Kowtow Ritual in the Qianlong Reign of Qing China）。

- ¹ 甘懷真，〈天下概念成立的再探索〉，《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9，（2010，北京），頁 333-349；甘懷真，〈重新思考東亞王權與世界觀——以「天下」與「中國」為關鍵字〉，《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頁 1-51；杜正勝則將中國視為一個連續的實體，放在萬年的尺度思考，並梳理「中國」作為天下之中的建構過程，以及「中國」與天下的關聯，此事從而掀起一陣網路上討論「中國」擴張概念的風潮。參見杜正勝，〈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古今論衡》，39 期（2022，臺北），頁 1-58；杜正勝，《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臺北：一卷文化，2023）。
- ² 張瑞德，〈天與人歸：中國政治思想中的政治權威合法性概念〉，黃俊傑主編，《理想與現實》（臺北：聯經，1982），頁 108。
- ³ 甘懷真，〈秦漢的「天下」政體：以郊祀禮改革為中心〉，《新史學》，16 期（2005，臺北），頁 22。
- ⁴ [美]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一種初步的構想〉，收入氏編，杜繼東譯，《中國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1-13。
- ⁵ 尤淑君，《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緒論；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二版）》（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
- ⁶ [日]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日]濱下武志，李侑儒、許佩賢、郭婷玉等譯，《海的亞細亞：濱下武志跳脫陸地中心的史學視野，海洋如何奠定亞洲的貿易、移民、世界觀和國際秩序》（臺北：大家出版，2023）；[日]岩井茂樹，廖怡錚譯，《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臺北：八旗文化，2022）；其餘關於中、日、韓國學界對於古代東亞國際關係的討論，可以參考李孟恆的碩士論文的研究回顧，作者分析日、韓學界學說史發展，並指出中文學界中未深入討論的東亞國際關係議題。李孟恆，〈從朝鮮、滿洲間的逃人刷還問題看十七世紀東北亞國際秩序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5。

上述研究以討論中華世界秩序的「現象」為主，對於秩序背後原理的討論，則是在張啟雄教授以儒家倫理觀，提出「中華世界秩序原理」，說明天下就是中華世界帝國，天子在其中是中華世界帝國的皇帝，周邊諸侯國為臣屬之國，天子透過臣屬國國王，間接管轄臣屬國國民。⁷ 此框架下中華帝國在面對外國來者時，藉由冊封、上表、納貢、賞賜等方式，確認皇帝與外國來者間的君臣身分，將外國定位為藩屬，進而納入中華世界秩序之中。⁸

然而，在晚近學界對天下學說的討論之中，重新反思這類模仿帝國主義宗主國與附庸國模式的「天下觀」，其實在歷史中國之中，難以找尋符合該原則的史實案例。⁹ 但即使如此，先行研究者們在天下觀念的討論中，敏銳且有意識地捕捉到中國對外的往來模式，在傳統文獻語境中以「禮」作為媒介，例如冊封、上表、納貢、賞賜等。同時，學界大多認可歷史中國透過禮儀行為的安排，能夠反映現實政治文化的象徵意義。因此筆者認為能將禮儀行為用於觀察天下制度之下，雙方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的互動關係。¹⁰

在歷史中國的對外關係中，所要面對不啻來自沿海、東南亞或東北亞地帶的諸多政團，同時也需要應對來自內陸亞洲的諸政團。因此，哪個朝代與禮儀制度適合作為重新理解天下制度的切入點？又有哪個禮儀制度能夠體現反映雙方建立關係？抑或是哪個政團與清朝之間建立聯繫同時體現中國與內陸亞洲的特性？為了回答這些問題，筆者在斷代上選擇兼具中國與內陸亞洲政治傳統，並身處在近代轉型之際的清朝，具體而言是聚焦在乾隆朝。

在對外關係的選擇上，筆者想透過乾隆帝平定準噶爾後，才正式歸附並成為藩屬的哈薩克諸部。正因為哈薩克諸部作為中亞部落政團中較早與清朝建立聯繫的政團，對於日後巴達克山、浩罕等內陸亞洲諸政團相繼與清朝建立關係具有一定的示範作用。並且筆者認為哈薩克的案例，在朝貢體制學說常以東亞海域的諸政團之外，則提供來自內陸亞洲的視角。而在禮儀選擇上，則是選擇清朝面對中亞諸政團時，由理藩院負責引導與安排需要執行的禮儀，即與朝貢禮儀略有區別的「朝覲禮」。這點正好也是本文主標題「遣使入覲」的由來之一。據筆者收集《清實錄》的相關史料中，該成語大多用在哈薩克諸部等中亞政團，因此對清朝而言「朝覲」或「遣使入覲」一詞具有特定的使用語境。

⁷ 張啟雄，〈「中華世界帝國」與琉球王國的地位——中西國際秩序原理的衝突〉，《第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1991），頁419-474。

⁸ 高明士，《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⁹ 甘懷真，〈從天下到地上：天下學說與東亞國際關係的檢討〉，《臺大東亞文化研究》，5期（2018，臺北），頁290-292。

¹⁰ 尤淑君，《禮賓到賓禮：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緒論。

同時，清朝作為歷史中國之中，少數採行雙語體制的王朝，其語言的特殊性，還能用以擴充理解漢文的語境。例如清王朝使用的朝覲禮概念，在《周禮》中是指諸侯朝、覲天子的禮儀，如《禮記·經解》「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或《禮記·樂記》「朝覲，然後諸侯之所以臣」等。而如果以滿文概念理解「朝覲」，比如民間滿漢文辭書《大清全書》所收 *dele hengkilefi*（朝覲），該詞從滿語直譯為漢文是「向聖上叩頭」。由此可以推論清王朝在沿用明代禮制與內亞政治傳統時，會依據自身的政權統治的需要，擴充詮釋古代禮儀的意涵，這點也使得滿、漢文獻出現語意上的差距。

總之，本文將環繞在兩個面向，一是探討「參漢酌金」的清朝，如何將朝覲禮結合中國與內亞政治傳統，應用在對外關係的概念中，比如漢、滿文之間朝覲概念的變化。同時，筆者認為如果要理解清代朝覲制度在天下學說中的意義，則應該放在地上政團，或所謂「地上的歷史行動者」互動的角度思考。¹¹ 因此筆者將透過滿文檔案，梳理清朝是如何與哈薩克諸部之間建立關係，以及朝覲禮在之中有何種意涵。最後，筆者想從朝覲制度的實踐，探討清代天下政體制度下的「國際秩序」，以及其背後的歷史意義。

從費正清到「新清史」視野下中國的世界秩序

關於天下學說的討論，最早由費正清在《中國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論文中提出。他統合該論文中針對古代中國朝貢關係研究，以及《大清會典》等官書材料，將「天下」的概念用於描述傳統中國世界秩序與地緣政治結構：以中國為圓心構成三重環繞中國的圈，向外依序是漢字圈、內陸亞洲圈，以及包含西洋、俄羅斯的外圈，而且未開化的周圍國家是因仰慕中華文明而攜帶貢物表示臣服。在費正清的預設中，天下的屬國與中國之間，屬於等級制的國際關係，並非平等觀念的外交關係；同時，參與中國的世界秩序的異族統治者，唯有遵守適當的禮儀。而這些禮儀統稱為朝貢制度，並且只有在遵守這個制度的前提下，外國才獲准以貿易獲得更進一步的經濟利益。¹²

然而，費正清的學說假設傳統中國為一個延續不變的整體，忽略中國內部政治演進的過程，因此有許多海內外學者針對他的論點進行討論。¹³ 其中不乏強調

¹¹ 雖然甘懷真主要集中探討公元十世紀之前的中國王權發展，但筆者認為類似的政治結構與政團間的互動，能延續至前近代的中國領域中。見甘懷真，〈從天下到地上〉，頁 291-313。

¹² 費正清，〈一種初步的構想〉，《中國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頁 1-17。

¹³ 最早在費正清的弟子衛思韓（魏而思，John E. Wills Jr.）就透過荷蘭使團覲見康熙帝的案例，主張朝貢制度在明朝以前並不存在。John E. Wills Jr.,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84, pp. 172-173；如前文當中以引介李孟衡的碩士論文所做的中、日、韓的學說史回顧；以及蔡偉傑，〈多元視角下的朝貢體系與中外關係史研究〉，《全球史評論》，第 23 輯（2022，北

探討互市貿易在其中的作用，如濱下武志運用經濟圈的概念，闡明中國周邊「華夷秩序」與「朝貢制度」的政治結構，並強調 19 世紀以後歐洲各國透過條約體系，為此地區帶來新的經濟活力；¹⁴ 岩井茂樹強調清帝國具有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從而使得中國擺脫明代封閉的「天朝秩序」，並在民間蓬勃的跨國貿易基礎之上建立「互市秩序」；¹⁵ 或是廖敏淑從貫時性的角度，將互市通商視為中國固有的制度，並強調以朝貢儀禮所建立的「朝貢體系」，對於中國外交體系曲解，以及其未必能解釋政治與通商間，仍有兩者不互相干涉的空間等。¹⁶

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的政治現實，又帶起了一輪關於東亞傳統國際政治秩序的討論，其中針對「何為天下」，便激起海內外學界的研究。在臺灣學界就有將天下制度與儒家傳統倫理觀念結合，¹⁷ 或是將天下制度視為一種東亞政體的學說等等。¹⁸ 而在中國學界則以清代政治情勢討論天下觀念的研究，如陳尚勝指出清代的朝貢體制不同於明朝，清代具有防禦功能以維持邊疆穩定，¹⁹ 或是張永江在《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變遷為中心》，以天下框架討論屬國。²⁰ 另外，亦有針對朝貢制度研究回顧，從中亞國家罕薩的案例強調應該使用滿文以深入研究的建議。²¹

隨著朝貢體制研究日漸深入，美國學界也對於費正清基於朝貢體制提出的中國傳統世界秩序進行修正，在《中國的世界秩序》中，早有學者提出朝貢體制的例外。²² 晚近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研究學者指出以中國為中心的框架，忽略清代內部的複雜的非漢民族在清帝國當中的作用，如何偉亞（James L. Hevia）以多主制的概念，詮釋清帝國與其各領土之間的關係，以勾勒馬戛爾尼來華覲見禮儀問題時，清帝國對外認識的背景。²³ 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在其探討清代新疆政治經濟史的著作《嘉裕關外》，則更深入構擬出清帝國的族群政策圖像，以清皇室為核心，分而統治政權境內的滿洲、蒙古、漢、藏與穆斯林等族群，並且讓他們盡可能保持互不干擾的狀態；而清王室也運用不同方式保持與族群之

京），頁 275-284。

¹⁴ 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

¹⁵ 岩井茂樹，《朝貢、海禁、互市》。

¹⁶ 廖敏淑，〈第一部通商制度〉，《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二版)》，頁 3-23、71-145。

¹⁷ 張瑞德，〈天與人歸——中國政治思想中的政治權威合法性概念〉，頁 108。

¹⁸ 甘懷真，〈天下概念成立的再探索〉；甘懷真，〈重新思考東亞王權與世界觀——以「天下」與「中國」為關鍵字〉。

¹⁹ 陳尚勝，〈試論清朝前期封貢體系的基本特徵〉，《清史研究》，2，(2010，北京)，頁 86-94。

²⁰ 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變遷為中心》(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

²¹ 蔡偉傑，〈多元視角下的朝貢體系與中外關係史研究〉，頁 278-279。

²² [美]衛思韓，〈清朝與荷蘭的關係，1662-1690〉，收錄自《中國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頁 240-276；蔡偉傑，〈多元視角下的朝貢體系與中外關係史研究〉，頁 280-284。

²³ [美]何偉亞（James L. Hevia）著，鄧常春譯，《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 35-63。

間的互動關係，諸如交換禮物、覲見、通婚、秋狩、宗教庇護、個人聯繫、資助學術、帝國巡遊等等，使得其成為皇帝—臣民的關係。²⁴ 同樣從清朝與內陸亞洲政團關係出發，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則基於哈薩克的案例，強調哈薩克貢使在清帝國的概念下未必是外人，貿易行為也未必是入貢，清帝國與他國之間所尋求雙邊關係，則是需要在特定經濟需求、文化定義與安全目標等各自脈絡中進行探討。²⁵ 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在他那本乾隆帝傳記著作中，也提及乾隆時期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係，略述清帝國的朝貢體制的性質，並非如費正清所認為具有中央與屬國間的階序關係，而是清帝國在面對不同政體時，有其相應策略。²⁶

綜觀費正清以降的學者們所探討的朝貢體系，大多數以修正或反駁的立場，他們多主張費正清所認為歷史中國的對外關係中 (或具體來說清代中國)，只有禮儀性質為根基，且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在歷史的現場並非如此。這些晚近學者針對朝貢體系學說的探討，大多是以實際的互市通商貿易，進一步反駁費正清的理論，並將禮儀關係的探討默認為相對表層，甚至是一種不切實的矯飾。禮儀本身之於清代中國的意義為何，又如何將禮儀與對外關係聯繫？或許得從大清政權建立以來的禮儀制度談起。

如何理解清代禮儀？

過往學界在討論清朝能夠建立長期政權的原因，歸結於金國積極學習漢文化，才能突破原先部落政權的侷限，從而成為能夠定鼎中國的新王朝。然而，晚近由美國新清史研究帶動浪潮，²⁷ 則直指傳統清史研究「漢化說」框架的侷限。「新清史」學者認為滿洲政權得以成功，是因為清朝保留滿洲的族群特性，以及維持自身作為非漢族群的意識，使統治者能夠超越傳統夷夏之防的觀念，²⁸ 採取多元

²⁴ [美]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著，賈建飛譯，《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 266-268、300。

²⁵ [美]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著，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臺北：衛城出版，2021)，頁 424-428。

²⁶ [美]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著，青石譯，《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臺北：八旗出版，2017)，頁 238-270。

²⁷ 美國學界關於清政權是否「漢化」的爭論，最著名的是羅友枝與何炳棣的論戰，可以參考劉鳳雲，《清代的國家認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 3-6、155-158。轉引自尤淑君，〈從汗國到帝國：金至清初賓禮制度的更定〉，《故宮學術季刊》，32 卷，2 期 (2014，臺北)，頁 2，註 1；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桃園：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4)。

²⁸ 典型案例是雍正帝駁斥曾靜對他的指控所出版的《大義覺迷錄》，其中就將三代君王本出於夷，是因為得到天命才能治理中國，透過上古聖王的權威性證實清政權的合法性，因此漢人主張的夷夏之防，本就不成立。關於大義覺迷錄的事件細節，可參閱[美]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著，溫怡溢、吳家恆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臺北：時報出版，2015) 以及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臺北：聯經，2014)，頁 341-393。

彈性的方式管理非漢族與漢族地區，甚至借用各部族的文化符號與政治傳統，建立了多族群融合的多元帝國。

在此浪潮下禮儀也是重要的一環。日裔美籍學者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 在討論清代宮廷禮儀的多民族性時，就主張清帝國的禮儀是多民族的禮儀同步並行，而非將儒家禮儀視為國家唯一禮儀。清代皇室針漢人官僚採用儒家典禮，如對漢地農業社會影響重大的祈雨禮；面向蒙古人與西藏人，則贊助藏傳佛教信仰；以及在保持滿洲民族性的目標下，編纂薩滿儀式相關的禮儀典籍，如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等等。羅友枝認為國家禮儀不斷演變，才能滿足帝國的不斷變化，以凝聚不同族群的臣民。²⁹

而何偉亞則透過清帝國與英國的對稱研究，指出清帝國為「多主制」，而清帝具有多種身分，即作在為「天子」的同時，亦是金、元朝的繼承者、可汗中的可汗、轉輪王、法王、文殊師利菩薩化身與滿洲第一家族愛新覺羅氏的領袖，也是各民族的征討者兼保護者，而清帝的這些並存的名號，標識「清帝國和滿族帝國主義的性質」，並通過賓禮儀式，建立「宇宙—道德」的觀念，將清帝塑造成帝國境內唯一主宰，維護清帝在多元政體中最高君主地位。³⁰ 尤淑君認為何偉亞將「禮」視為一種兼具實用性的宇宙論，超越了禮儀象徵性與功能性解釋。³¹ 不過在此需指出其論點亦遭受許多學者的質疑，像是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指出何偉亞將漢文翻譯詮釋成英文時，產生額外的衍伸意義，卻成為該書的立論詮釋史料的依據。³²

同為詮釋禮儀及禮儀典籍的研究，司徒安 (Angela Zito) 《身體與筆》則在晚明至清初思想史的伏流變化的時代背景下，以人類學視角討論清代乾隆朝禮儀。司徒安分析清代禮儀觀念與實際運作背後的意義，並將典禮所規範的行動者們，是如何環繞在乾隆身邊的禮儀行為，藉此探究以詮釋其典禮背後的世界觀，其中司徒安認為《大清通禮》的存在，是彰顯政治象徵的重要文本，而其運作機制即是在文字與禮儀所規範的身體展演之間體現。³³

將目光放在討論清軍入關前禮儀制度形塑期的研究，如吳榮恩以《老滿文檔》探討努爾哈齊時期的禮儀實踐。他認為此時的禮儀具有滿洲民族特色，展現汗國

²⁹ [美]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 著，周衛平譯，《最後的皇族：清代宮廷社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³⁰ 何偉亞 (James L. Hevia)，《懷柔遠人》，頁 32-33。尤淑君，〈從汗國到帝國〉，頁 83-84。

³¹ 尤淑君，〈從汗國到帝國〉，頁 84。

³² [美]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著，尚揚譯，〈後現代式研究：望文生義，方為妥善〉，《二十一世紀》，44 期 (1997，香港)，頁 105-117。

³³ [美]司徒安 (Angela Zito)，《身體與筆：18 世紀中國作為文本／表演的大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內部成員的等級性，並且此時的滿洲風俗影響日後的清朝禮制的建立。³⁴ 而尤淑君則以後金時期的賓禮制度為例，探討金國如何把部落習慣和明朝典制融合為新禮儀制度，進而討論金國的政治變化、賓禮禮儀的制訂及其政治文化意義。尤其是從努爾哈齊到皇太極時期，逐漸規範禮儀制度，諸如文書稱呼、行禮動作、座次安排的安排，區分尊卑等，進一步對內確立金國汗與諸貝勒之間的君臣關係；對外也彰顯金國的政權正當性，進而確定金國與明朝、蒙古、朝鮮之間的名分秩序。在皇太極統治下金國歷經「汗國」往「帝國」的體制轉型期，皇太極則是透過稱帝、改國號為清、引入明朝典制，再融入過去的部落習慣，從而創造出新的賓禮禮儀與禮秩意義。³⁵

而在近年則有探討清初禮儀的英文專書，克禮(Macabe Keliher)的 *The Board of Rites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hina* (筆者譯：《禮部與清代中國的建構》)。本書強調清朝建政以來禮部對於國家建構的作用。禮部是一個將部落政治逐漸變成皇權統治規範化的機構。在皇太極上位初期政權的權力構成，偏向諸大貝勒聯盟，而非獨由汗王統治，在此情況下即可透過禮部將權力關係規範化，並進一步形塑汗王的政治權力，克禮所定義禮的性質，是一種歷史行動者們共同遵守的概念，能夠規訓行動者的行為，而參與並服從禮儀者，則是同意制定禮儀規則之人的權力。最後書中以紀錄國家常規的康熙朝《大清會典》修纂，視為整個以禮統御滿洲、蒙古與漢人的集大成。³⁶ 同時，筆者認為克禮將康熙朝《大清會典》編纂作為書中禮儀論點的實例，則能夠藉此討論日後不同皇帝修訂的《大清會典》中關於禮部、理藩院等掌有對外關係的機構，是如何在清朝的歷史發展下演變。

至於專門以漢文史料統整朝貢、朝覲制度與文書的研究中，以何新華處理朝貢制度的研究為集大成者。不論是從《清實錄》等官修典籍中輯出探討各國朝貢文書漢文本的《清代朝貢文書研究》，還是以清代禮儀演變的角度，分析影響到清代外交禮儀制度的《威儀天下：清代外交禮儀及其變革》；³⁷ 抑或是他從物質層面探討來自各地的貢品、貢物，及針對其背後實際制度運作考察的研究《清代貢物制度研究》、《最後的天朝：清代朝貢制度研究》等等。³⁸

³⁴ 吳恩榮，〈清朝禮制的起源：努爾哈齊時期的等級性汗國禮俗〉，《肇慶學院學報》，42卷，6期，(2021，肇慶)，頁12-18。

³⁵ 尤淑君，〈從汗國到帝國〉，頁102-110。

³⁶ Macabe Keliher(克禮), *The Board of Rites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pp. 1-23.

³⁷ 何新華，〈威儀天下：清代外交禮儀及其變革〉(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

³⁸ 何新華，〈清代朝貢文書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何新華，〈最後的天朝：清代朝貢制度研究〉(廣州市：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何新華，〈清代貢物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總之，上述研究各自涉及清代禮儀本身作為行為規訓、宇宙觀與國家與族群建構等面向，並探討禮儀實踐的意義。至於其他清代禮制研究，則多為制度史的實證研究，或禮儀通論中介紹部分，³⁹ 因此筆者將其作為本文，該如何將清朝禮儀特性定位在中國史架構的參照物，以及筆者選取一手史料版本的依據之一。

理藩院、藩部與內陸亞洲

如果要討論朝貢體制與內陸亞洲之間的關係，與禮部同級的機構理藩院的作用則不可忽略。由於早期探討朝貢貿易的典範，像是清末傳統禮制受到外部衝擊，清朝將傳統賓禮體制調整成為能夠接待外國公使的禮賓禮儀。⁴⁰而在這樣的討論下，大多關注在海上外部勢力，是如何改變中國及其朝貢國的關係，因此容易忽略內陸亞洲在朝貢體制中的意義。

賈寧在她的博士論文“*The Li-fan Yuan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筆者暫譯〈清朝前期的理藩院〉），⁴¹ 以及日後相關的研究中，從行政、文化和經濟三方面，闡述由理藩院安排藩部禮儀的功能，如朝覲（*dele hengkilembi*）、圍獵和朝貢（*albabun jafambi*）等等。並指出這些禮儀成為內亞政團人群與清朝之間關係的體現，以及這些人群認同清朝政治權威的基礎。⁴² 同時，賈寧還比較清朝的朝覲制度，以及此前朝代的朝貢體制之間的差異，並指出理藩院主導下的朝貢模式，將朝貢體制慣有的經濟因素削弱到最簡，從而強調其禮儀性質的一面，這也讓清朝更樂於以互市，而非朝貢的方式處理邊疆問題。⁴³ 而理藩院的功能性解釋，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則強調相較於禮部管轄下的朝貢國家，在面對中亞外國政團時，其實更為鬆散靈活，甚至能與清朝保持相對平等的關係；同時理藩部及其附屬機構在面對蒙古、西藏、新疆等藩部時，其透過該地區的首長統御該地，甚至可以媲美同時期歐洲各國海外殖民機構的能力。⁴⁴ 不過，狄宇宙未談論外藩或是中亞部落與清朝之間的禮儀互動，乃至於實際的關係建立。

此外，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在受到朝貢體制學說的影響，將禮部、理藩院、朝貢、賓禮、藩部等，以今人眼光來看，帶有對外關係的機構或制度，進行闡釋

³⁹ 就目前筆者蒐集到關於禮儀的通論如下：羅艷，《大清皇室的祭典禮：禮儀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吳麗娛主編，《禮與中國古代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陳戍國，《中國禮制史：元明清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曹建墩、湯勤福等，《中國禮制變遷史：第四冊》。

⁴⁰ 尤淑君，《賓禮到禮賓》。

⁴¹ Ning Chia, “The Lifanyua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Ph.D. dissert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1.

⁴² Ning Chia (賈寧), “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 (1644-1795),” *Late Imperial China*, Volume 14, (1993), pp. 60-66.

⁴³ *Ibid.*, pp. 82-86.

⁴⁴ Nicola Di Cosmo,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Inner 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2, (1998), pp. 287-309.

與討論。像是宋瞳藉由「以事帶制」的敘述方式，歸納統整理藩院滿蒙題本於同類條目下，藉由事件脈絡與始末，總結當時理藩院在處理該類地區事件中所遵循的原則與措施，進而總結理藩院對外事務的運作模式。⁴⁵ 曹雯的《清朝對外體制研究》中，藉由明清歷朝《會典》等材料，指出以冊封為核心，並強調由明朝到清朝的「藩」概念擴大之下，「藩封體制」框架中清朝與周邊國家、地域關係。⁴⁶ 至於集中探討蒙古諸部的李治國，運用規訓與懲罰的理論，強調理藩院如何藉由藩部賓禮在禮儀、宴請、賜號等方面約束內外藩蒙古諸部，使之更加臣服於清朝皇帝。⁴⁷ 而在張雙智的《清代朝覲制度研究》中，他將朝覲制度放在歷史中國的脈絡思考，梳理從周到清代朝覲制度變化，並將年班制度視為清代朝覲制度形成的根基，進而討論蒙古、西藏、新疆等地首領的朝覲活動。⁴⁸ 抑或是深耕在理藩院研究已久的趙雲田，以白壽彝《中國通史》的體例，梳理清代理藩制度的發展史。⁴⁹

不過，上述研究相對缺乏針對滿文概念演變的討論，比如雖然賈寧的研究是筆者現階段蒐集材料中，唯一強調朝覲滿文在語意上不同於漢文的先行研究，但她未針對相關語意變化進行討論，這點筆者將在第二章著重討論。又或是張氏在討論清代機構、政治實體與禮儀行為時，是立基於二十四史的材料進行詮釋，甚至沒有提及理藩院的滿語是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漢文直譯為「處理外部省的院」，⁵⁰ 或是朝覲的滿語概念等等。因此，筆者認為他的詮釋難免有穿鑿附會的可能。同時，張氏在預設討論朝覲實施的對象時，是基於當代中國領土之下的民族，並帶有現代中國框架討論清代東亞的各個政團首領。因此筆者認為該書雖能夠勾勒出中央與藩部之間的互動，但沒辦法提供更加細微的角度，即從歷史行動者的立場思考朝覲制度與天下學說的關聯。

清朝與哈薩克諸部的關係

回到本文想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清朝與哈薩克諸部之間究竟建立何種關係？如果從《大清會典》紀錄對外諸國時的儀典文本結構來看，清朝將域外政團或國家歸納在外藩、藩屬國（朝貢國、冊封國）、互市國三個條目之下。哈薩克左、右部則歸類在屬於由理藩院負責的「外藩朝貢」。因此，即便名義上運用朝貢的

⁴⁵ 宋瞳，《清初理藩院研究--以順治朝理藩院滿文題本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⁴⁶ 曹雯，《清朝對外體制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⁴⁷ 李治國，《清代藩部賓禮研究——以蒙古為中心》（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4）。

⁴⁸ 本書討論蒙古、西藏、新疆伯克的年班制度。張雙智，《清代朝覲制度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第二、三、四章。

⁴⁹ 趙雲田，《清代理藩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⁵⁰ [美]米華健，《嘉峪關外》，頁 266-268、300。

詞彙描述，但清朝與哈薩克之間的互動方式，與禮部負責管理朝貢國相比，在禮儀與外交實踐上卻仍有所不同。

為此，筆者在此舉出使用史料取徑，以及基於材料歸納出來的清哈關係。目前中、日文學界針對清哈關係研究成果，大致上分為幾種：一是使用《清實錄》構建清哈之間外交互動的骨幹。比如厲聲《哈薩克斯坦及其與中國新疆的關係》書中幾章勾勒清朝與哈薩克諸部之間貫時性的互動變化，並強調清哈之間是宗藩關係，清朝以宗主國的姿態負責管理作為藩屬國的哈薩克；同時，這段宗藩關係直到清末，才受到對俄外交條約的影響而喪失。⁵¹

二是國際關係說，主要來自於蘇聯時期的俄文中亞歷史著作，並且這些研究大多強調清朝、浩罕、哈薩克與俄國等，類似於國與國之間的互動。而哈薩克選擇歸附清朝這一歷史事件，從哈薩克的角度來看，應當是數種外交手段之一，此時哈薩克同時也與俄國保持互動，所以哈薩克對於清朝，並不算是實質上的「從屬地位」。在此茲舉哈薩克裔學者克拉拉·哈菲佐娃的《十四——十九世紀中國在中央亞細亞的外交》為例，她認為清朝與哈薩克之間的關係，屬於一種朝貢制度下的使團外交。⁵²

三則是在突厥學研究傳統，或是在能掌握滿文的學者下，對清哈關係在史實上進一步的探討，如野田仁、小沼孝博、郭文忠學者等。⁵³ 其中野田仁、小沼孝博在探討清哈關係時，指出清朝與哈薩克之間有主—客（*ejen-albatu*）的關係。而在討論另一個中亞穆斯林政團巴達克山的馬子木，也指出清朝與巴達克山建立關係時，延續這一關係表述的討論；⁵⁴ 而郭文忠則是強調各政團都有屬於自身描述對外關係的用語，不過清朝是否將其與漢文中「客」對譯，則仍有待商榷。⁵⁵ 此外，也有許多學者基於滿文檔案進行實際清朝與哈薩克關係的實證研究。⁵⁶

⁵¹ 厲聲，《哈薩克斯坦及其與中國新疆的關係：15世紀~20世紀中期》（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4）；洪濤，〈評乾隆皇帝的哈薩克政策〉，《西域研究》3期（2000，烏魯木齊），頁24-30。

⁵² [哈]克拉拉·哈菲佐娃，《十四——十九世紀中國在中央亞細亞的外交》（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⁵³ 小沼孝博，〈ヌサン使節の派遣— 1757年における清とアプライの直接交渉〉，《アジア文化史研究第14号》（宮城：東北学院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14），頁1-20；小沼孝博，《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東京：日本出版販売株式会社，2014）；Noda, Jin(ed.), Takahiro, Onuma(ed.),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Tokyo: Department of Islamic Area Studies, Center for Evolving Humanities,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⁵⁴ 馬子木，《經略西北：巴達克山與乾隆中期的中亞外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⁵⁵ 郭文忠，《乾隆時期與哈薩克諸部關係研究》，頁187。

⁵⁶ 郭文忠，《乾隆時期與哈薩克諸部關係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英卡爾·巴合朱力，〈乾隆朝接待中亞各部朝覲使團之禮儀及其效用〉，《清史研究》，5期（2023，北京），頁49-62；吳阿木古冷，〈1755-1758年間阿睦爾撒納與哈薩克阿布賚汗關係考〉，《西蒙古論壇》，4期（2014，烏魯木齊），頁7-15。

總之，筆者將透過現有清哈關係的研究成果，重新梳理哈薩克諸部入覲的史實，以回應清代朝覲禮儀在天下政體中的意義。同時，滿文檔案的研究方式，因為清哈之間的文書往來，多為滿文、托忒文與察合台文等內陸亞洲語言之間的互譯。這點也有助於筆者透過滿文文獻本身的相對明確性，以及透過乾隆帝為因應他所統治的時代，所發明的一批新詞彙（或可說是概念上的擴充），以及其滿洲語意變化，作為一種經典詮釋的依據。才能釐清當時清朝人是如何闡釋「朝覲」這一個源於周代的漢文概念。

二、何謂朝覲？從以清代辭書中的政治概念談起

meni colgoroko enduringge amba han, gosin abkai adali, eiten gurun be emu booi gese tuwame, tumen irgen be fulgiyan jui adali gosime ofi, tuttu abkai fegergi gubci baingge horon de geleme, erdemu be hukšeme yooni yamulame hengkilenjimbi, elcin takūrafi alban jafanjirangge umesi labdu.

我至聖大皇帝其仁如天，視萬國猶一家，保萬民如赤子，是以普天率土，莫不畏威懷德，來享來王，其遣使進貢朝覲者甚眾。

清 圖理琛，《滿漢異域錄》

在太祖朝《滿文老檔》、《滿洲實錄》等涉及清朝開國史的滿文材料中，在表達人身禮儀行為的用語中，莫過於叩頭（hengkilembi）最為頻繁。而這些文獻中，主要涉及的對象多為汗接受貝勒、大臣的叩頭禮，或是汗（han）在祭天時，率眾人叩拜天、堂子等具有政治象徵物。⁵⁷ 而這樣的禮儀用語蘊含從部落聯盟人身依附關係。⁵⁸ 在現實政治格局下，往往依照禮儀劃分等級制人身關係的轉變。在此過程中諸如主奴、主賓等君臣的關係確立，以及清朝與藩部、外藩、朝貢國之間主賓關係的界定等等，也都一再影響日後清代禮儀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禮儀現象背後反映的政治關係，筆者認為能更作為理解日後滿人選擇將朝覲與叩頭（hengkilembi）對譯的原因之一。而在此背景下，筆者想透過具有定義性質的辭書文本，探討滿、漢文的朝覲概念演變。

若從貫時性角度，歸納清朝入關後的朝覲制度。依照對象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外省官員朝覲；二是邊疆地區的官員、蒙古王公與喇嘛；三是外國使節。⁵⁹ 而在當前針對外國使節的研究中，主要探討傳統王朝在面臨《萬國公法》國際秩序後，如何將現代外交觀念反映在古代朝覲禮儀之中，從而形成賓禮的調整與妥協。⁶⁰ 若將這些研究放在筆者想聚焦探討「天下政體」理論的脈絡中，則屬於天下之

⁵⁷ 據筆者整理在太祖朝《滿文老檔》，1-15 冊中，共有 53 處使用叩頭（hengkilembi），其中少數使用跪叩（niyakūrame hengkilembi）；《滿洲實錄》，8 冊中則共有 55 條。另外，須要強調筆者在此使用的材料是乾隆年間重新修訂的滿文老檔，在此作為朝覲概念詞頻的參考，不過，這樣的研究取徑應當可以用在進一步分析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滿文老檔原件。

⁵⁸ 孫啟仁，〈清初滿族跪拜禮簡述〉，收入《第三屆國際滿學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頁 207-218。

⁵⁹ 張雙智，《清代朝覲制度研究》，頁 15-17。

⁶⁰ 尤淑君，《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尤淑君，〈清代覲禮之爭與賓禮變革〉，《中華禮制變遷史》（北京：中華書局，2022），頁 340-399。

外的國家／政團間的互動。在筆者下文的討論中，主要是將外省官員、邊疆地區的政團首領的朝覲禮，放在君臣互動的歷史脈絡來理解，尤其是在「禮制中的諸符號不只是政治權力的反映、工具與裝飾，其本身就是權力」，「權力是必須借由禮儀符號以展示」等原則。⁶¹

歷史中國的「朝覲」語境

所謂「朝覲」，在《周禮》記載中與聘問、狩獵、會盟等並列，且皆屬於賓禮的儀式。而在《禮記·經解》：「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或《禮記·樂記》：「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等，⁶² 則體現朝覲禮能夠明定周天子與四方諸侯之間的君臣名份、尊卑位階等關係，從而形成以周天子為核心的禮治社會。隨著周王室與其相應的政治天下政體式微，但朝覲禮儀的精神與原則，以及朝覲作為一種語言符號，如同先秦禮觀念本身，不斷被歷史行動者賦予新的思想要素，並且不同的歷史行動者也運用禮儀包含的語言內涵，建構出一套政治論述。⁶³

在《二十四史》中，據統計使用「朝覲」一詞的材料約 180 篇；使用「朝貢」一詞的材料約 330 篇，在秦漢以後，後世學者探討的朝貢一詞才開始出現在文獻之中，成為經常與朝覲並立，或取而代之的概念。⁶⁴ 但若細究兩者之間的概念差異，在往後的朝代中，朝覲概念主要乎涉及君臣之間，或是構擬成君臣關係的中國與諸政團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此茲舉幾個案例，如《新唐書》中時任婺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的柳冕，曾上表唐德宗李适，在安史之亂後各地割據的情況下，要求恢復地方官員入朝述職，以維持君臣之間的關係，柳冕在表中論道「夫朝會，禮之本也」、「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溘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眾，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⁶⁵ 或是《宋史》中，記載司馬光在官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獲得「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的待遇，雖然司馬光不敢接受，但他的回應「不見君，不可以視事」，⁶⁶ 若以君臣關係建立的原理來看，側面點出朝覲的得基於君臣之間實際見面才得以成

⁶¹ 關於天下政體理論，參閱甘懷真，〈從天下到地上〉，頁 291-292；而關於禮儀與政治的詮釋則來自甘懷真，〈自序：兼論中國政治史研究的展開〉，《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2），頁七六、七七。

⁶² 《禮記·樂記》（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91），頁 77。

⁶³ 甘懷真，〈先秦禮觀念再探〉，《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頁 1-10。

⁶⁴ 張雙智，《清代朝覲制度研究》，頁 7-8。

⁶⁵ （宋）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一百三十二，列傳第五十七 劉吳韋蔣柳沈，頁 4537-4538。

⁶⁶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頁 10768。

立的意義。總之，從貫時性的角度分析歷史中國的朝覲概念，可以歸納出一個原則：親自面見的前提下，展現中國君主與政團首長、官員之間的關係。


清代語境下的朝覲

由於漢文世界的知識分子對於語言符號的認識，往往是基於該詞組與上下文語境進行推斷，因此容易導致在時間上，需要經學家注疏詞義，才能使時人理解經典的要旨；而在空間跨度上，諸如日本、朝鮮、安南、琉球等共享漢文文化圈的儒家知識分子們，則得透過訓讀，從而理解經典的意義。⁶⁷而過往學者在討論清代禮儀觀念時，經常會忽略清朝統治者本身也具有一套反映內亞政治要素的語言傳統，從而忽略在官方文本在滿漢並行的情況下，滿文未必能直接對譯漢字文本的內容，而是挪動滿文本意中的特定概念來「註解」漢文。

因此在這原則上，透過滿文討論朝覲作為一種政治概念，或許能夠閱讀出早期學界未注意到的政治概念與語言象徵。不過，在針對滿文朝覲進行語文學關鍵字分析之前，還是得先討論清朝官方是如何定義構成「朝覲」詞組的漢字。在《御製康熙字典》這本成書於康熙 55 年（1716）的漢字字典中，與朝覲相關的漢字有「朝」、「覲」、「聘」，字義如下（表一），由此可見在漢字語境中「朝」的「臣見君曰朝」；「覲」的「下見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以及「聘」的「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的概念。

	字義	卷別	頁碼
朝	爾雅·釋言：陪朝也。 註：臣見君曰朝。 書·舜典：羣后四朝。 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 註：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 禮·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疏：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其三是臯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 又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又同類往見亦曰朝。	辰集上	2414，第 3 字
聘	說文：訪也。 徐曰：聘，訪問之以耳也。 廣韻：問也。	未集中	4619，第 5 字

⁶⁷ 關於東亞漢文訓讀的討論，可見[韓]金文京，《漢文與東亞世界：從東亞視角重新認識漢字文化圈》（臺北：衛城出版，2022）。

	禮·曲禮：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 公羊傳·隱十一年：大夫來曰聘。 穀梁傳·隱九年：聘，問也。 周禮·秋官：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儀禮·聘禮：大問曰聘，小聘曰問。又昏禮娶問亦曰聘。		
覲	爾雅·釋詁：覲，見也。 疏：下見上也。 書·舜典：乃曰覲四岳羣牧。 禮·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註：春見曰朝，秋見曰覲。	西集上	5442，第 5 字

表一、武英殿本《御製康熙字典》中關於朝覲字義表⁶⁸

滿文語境下的朝覲

朝覲滿文的討論，可以追溯至賈寧關於理藩院禮儀的研究。⁶⁹ 但她的觀察還停留在表面，即康熙年間沈啟亮筆下相對早期的對譯方式，並沒有從語意與詞彙變化的面向進行討論。然而，清代的滿文並非一成不變，所以筆者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將會貫穿清朝前期朝覲滿文用語的語意變化。

自從明萬曆 27 年（1599）二月，太祖努爾哈齊下令額爾德尼與噶蓋，運用蒙古字母拼寫女真口語創制滿文後，該如何吸納並對譯漢文中的專有名詞，向來是一個問題。入關前的滿洲學者在大量翻譯漢文典籍時，面對滿語原生詞彙缺乏的概念時，通常會直接使用滿洲字音寫漢文的方式應對，比如許多詞彙等，往往是漢語音譯，如四譯館（sy i guwan）、經歷（gingli）等，甚至有些時候詞彙的拼音用字，會因為滿洲人難以分辨南京官話中尖團音的差異，如滿文字母 c、j、s 與 k、g、h 在表達漢語時容易混淆，導致滿語詞彙缺乏固定拼法。

清朝建立政權的一個世代後，隨著政局穩定與文教發展，在皇帝努力推廣國書、國語的人才選拔的社會環境下，導致滿洲語言的使用機會增加。文人學者則努力搭建滿語和漢語之間橋樑，並且試圖規範化專有名詞的對譯。一位來自江蘇的漢人學者沈啟亮（1645-1693），他自稱「余漢人也，且平生篤好清書」。⁷⁰ 康熙 22 年（1683），他編纂了第一部滿漢文字典《大清全書》，並以最直接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在這本收錄 12000 餘條詞條的字典中，可以明顯看到他的編排邏

⁶⁸ 〈康熙字典線上版〉，<https://www.kangxizidian.com/index.php>（2023 年 12 月 15 日檢索）。

⁶⁹ Ning Chia, "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 (1644-1795)," pp. 82.

⁷⁰ 佟永功，〈沈啟亮與《大清全書》〉，《滿語文語滿文檔案研究》（瀋陽：遼寧出版社，2009），頁 67。

輯是以滿文十二字頭為詞序；並且也記錄到滿文詞綴變化的差異。沈啟亮將滿文分為多為名詞的整字，以及具備動詞變化與時態的活動字。⁷¹ 同時，這本辭書也收錄當時滿譯儒家經典的文句，作為詞條的漢文解釋。⁷²

在《大清全書》中，「朝覲」的滿文是 *dele hengkilefi*，⁷³直譯為漢文為「向聖上叩頭」，並且除了與漢文「朝覲」對譯之外，同時也與「陛辭」對譯。⁷⁴而構成該詞組的動詞部分，則包含使役、過去、原形等口氣的動詞型態，如令人叩頭（*henggi* [命令式]）、叩頭（*henggilehe* [過去式]）、（*henggilembi* [原形]）、叩頭不已、頻叩頭（*henggišembi*、*henggišeme*）、叩頭去（*hengginembi*）、不叩頭（*henggilarakū* [否定]）。⁷⁵ 同時，也收錄其他以（*henggilembi*）為主的短語，諸如朝聘（*henggileme doroloro*）；拜而受之（*henggilefi alime gaimbi*）；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henggilere doroloro be erileme, jiramin geneme, nekeliyen jime, goloi beise be hefeliyembi*。漢語直譯：按時節行叩頭禮儀，厚待去著，薄待前來著，把外省的貝子（諸侯）懷抱），若將以上這些滿文短語，視為沈啟亮在所能蒐羅的材料中，則能推斷時人界定（*hengkilembi*）在漢文經典中所能對應的用法。因此，這本滿漢字典中「朝覲」的滿語意涵，多環繞在叩頭這一要素，而這點也出現在同時期的其他民間滿漢文雙語字典之中。

相較於《大清全書》是以十二字頭作為編排順序，接下來要討論其他本康熙年間出版的民間字典，都是以類書的形式整理滿文詞條，亦即依照門類劃分各種用語。這點或許受到明朝的分類辭書的影響。雖然在體例上看似直接沿襲，但若細究內部的滿漢詞彙的實際內容，會發現大部分的分類是依據當時旗人針對各類知識的認識，就好比尚武的滿洲人另立「軍器類」這一項目，相較之下與文相關的概念，則被攏統歸納在「文武類」之中；⁷⁶ 抑或是辭書收入各種關於馬的專有名詞，如「馬類」，即收錄馬種與涉及騎馬概念的詞彙多達 224 條。⁷⁷如此大量的專業用語出現，則來自於滿洲騎射傳統與馬所象徵的政治文化有關。⁷⁸ 總之，使

⁷¹ 佟永功，〈沈啟亮與《大清全書》〉，頁 67-68。

⁷²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A Dictionary of the Imperial Capital: Shen Qi liang's Da Qing quan shu (1683)," Editor: Glenn W. Most, Dagmar Schäfer, and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Plurilingualism in Traditional Eurasian Scholarship: Thinking in Many Tongues*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23), pp. 274-283.

⁷³ 《大清全書》，頁四十一，0841a。出自〈滿洲語辭典 Manchu Dictionaries〉，栗林均言語資料檢索システム，<http://hkuri.cneas.tohoku.ac.jp/p06/kdic/list?groupId=18>（2023 年 10 月 15 日檢索，下文皆出自於本網站，故省略）。

⁷⁴ 《大清全書》，頁四十一，0841a。

⁷⁵ 《大清全書》，頁四十四，1244a-1245a。

⁷⁶ （清）桑額，《滿漢同文分類全書》，〈目錄〉。（版本取自法國國家圖書館（BnF），<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90028228>）

⁷⁷ （清）桑額，《滿漢同文分類全書》，〈馬類〉，卷二十七。

⁷⁸ 關於清代馬匹政治文化與盛清時期的《清文鑑》系列中馬匹滿語詞彙的討論，可參閱林士鉉，

用不同版本的分類辭書的特點，即在於書中針對詞彙的分類與選用，以及日後在不同辭書中移動或刪改，從這點即能掌握這些詞會在當時知識分子的認識之中，應歸屬於哪些概念叢。

在康熙 32 年（1693）由旗人劉順與旗人桑格共同編纂，寄暢齋編輯出版的《同文彙集》，以及康熙 41 年（1702）由聽松樓再刷，即兩書同版異名的《同文廣彙全書》中，分別收錄劃分在形體類叩頭（hengkilembi）；⁷⁹ 成語類的陸見（dele hengkijimbi）、陸辭（dele hengkilembi）、朝覲（dele hengkijire）；⁸⁰ 以及劃分在喜喪類的准頭（hengkilembi）。⁸¹ 而在康熙 39 年（1700），由筆帖式桑額編纂由自省齋編輯出版的《滿漢類書》，以及日後於康熙 45 年（1706）由西河沿天繪閣書坊再刷出版的《滿漢同文分類全書》，這兩書則將相關詞彙：朝進（han de hengkilembi）、⁸² 叩頭（hengkilembi），⁸³ 劃分在人事類。這些涉及朝覲與其相關的詞彙，基本上分散在各種類型中，其中劃分在成語類則代表其已經逐漸成為當時的慣用語；而繁雜的分類項目，則顯示清初熟稔滿漢文的學者，在詞彙分類上並無齊一的歸納邏輯，則間接顯示相關概念的浮動與不穩定。

直到清朝官方陸續出版冠以「清文鑑」為名的字典，即所謂的《清文鑑》系列，諸如《御製清文鑑》、《御製增訂清文鑑》、《御製五體清文鑑》、《御製四體清文鑑》之後，「朝覲」這一個涉及中國古代的禮儀詞彙，以及用以表達此概念的叩頭（hengkilembi），則被統一分類在禮儀類的項目之下，同時在民間字典中出現的慣用語、套語，以及沈啟亮使用的短語詞條則被刪除，取而代之的是以滿文解釋滿文的官方權威註釋。

官方滿語的朝覲概念

官方辭書相較於民間辭書，更能作為探討皇帝個人意志介入觀念的切入點。在鍾烱探討「君部」詞彙順序與君主觀念的研究中，特別將這些官方辭書定位為貫徹清朝君主教化意志的產物，而非單純的文化工程。從這些辭書往往帶有「御製」（han i araha，即汗編纂的）的名義，因此能將其編修過程皆視為在皇帝密切

〈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4 卷 2 期（2006，臺北），頁 81-91。

⁷⁹（清）劉順、桑格，《同文彙集》，〈形體類〉，卷之二，頁十四 a。（版本取自法國國家圖書館（BnF），<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90027418.r=Tung%20wen%20wei%20ji%20bithe?rk=21459;2>）；（清）劉順、桑格，《同文廣彙全書》，〈形體類〉，卷之二，頁十四 a。（版本取自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

⁸⁰ 《同文廣彙全書》，〈成語類〉，卷之三，頁二 b、頁十四 a。

⁸¹ 《同文廣彙全書》，〈喜喪類〉，卷之三，頁二十九 b。

⁸²（清）桑額，《滿漢類書》，第三本，〈人事類 niyalma baita i hacin〉，卷之九（uyunci fiyelen），頁五 a。（版本取自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

⁸³ 《滿漢類書》，〈人事類 niyalma baita i hacin〉，卷之十（juwanci fiyelen），頁十八 b。

監督之下的產物；⁸⁴ 這點也能在現存的稿本詞條上的貼黃與修改痕跡中，證實皇帝確實親自介入字典的編纂。⁸⁵ 同時，這些辭書的編纂從康熙年間延續到乾隆晚年，其中又編入各種民族的語言，即多語言合璧辭書，因此能夠延伸討論朝覲作為一種禮儀觀念。下文主要將環繞在康熙年間的《御製清文鑑》，以及乾隆年間的《御製增訂清文鑑》與《御製五體清文鑑》這三本辭書的禮儀辭條中關於朝覲相關概念辭的編排方式。各版本清文鑑中禮儀詞條的分類，請參照本節末，頁 22（表二）。

康熙 47 年（1708），康熙帝敕修的第一部滿文辭典，本書在滿洲學者們「博諮於故老，參考於舊編」的同時，皇帝也親自審訂。而在《御製清文鑑》的項目 *dorolon tangse i šošohon*（禮儀總類）即是禮儀的相關詞條，參照（表二）。在這八類共 237 條中，涉及朝覲觀念的用語的分類，分別有 *dorolon i hacin*（禮儀類）、*yamulara isara hacin*（朝集類）、*doroloro hengkilere hacin*（禮拜類）。⁸⁶ 尤其是禮拜類當中收錄叩頭這一關鍵字詞，則佔該類 24 條中的四分之一，其滿文釋義與筆者漢文翻譯如下：

hengkilembi niyakūrafi uju be na de isibume doroloro be hengkilembi sembi
叩頭 跪下後，頭及地的禮儀稱作叩頭。

hengkilembi niyalma de hendufi hengkilere be hengkilembi sembi
使叩頭 使人叩頭稱作「使叩頭」。

hengkilenembi genefi hengkilere be hengkilenembi sembi
去叩頭 前去叩頭稱作「去叩頭」。

hengkilenjimbi tulergi gurun i niyalma, kesi fulehun be hukšeme gūnime, amban i doroi yamulame jidere be, hengkilenjimbi sembi
來叩頭 把外國之人，掛念著來感謝恩澤，用大臣之禮前來朝（衙門）叩頭，稱作「來叩頭」。

hengkilendumbi geren niyalmai hengkilere be hengkilendumbi sembi. geli hengkilenumbi seme gisurembi
一齊叩頭 諸多的人叩頭著稱作一齊叩頭；又稱作 *hengkilenumbi*。⁸⁷

⁸⁴ 鍾焯，〈君權總是選擇特定的語言來發聲——對“共時性君權”理論的反思與批評〉，《清朝史的基本特徵再探究：以對北美「新清史」觀點的反思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20），頁 131。

⁸⁵ 關於相關貼黃與硃批修改詞條的圖像 可見於 故宮博物館編，《同文之盛：清宮藏民族語文辭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119、127。

⁸⁶ 該書詞條沒有漢文，因此在這部分取《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官方漢文翻譯於括號內。

⁸⁷（清）馬齊、馬爾漢等撰，《御製清文鑑》（收入《曉星女子大學阿爾泰語資料集第三輯》，大邱：曉星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82），頁 83-84。畫底線處為筆者所加。

在這些詞條當中可以看見叩頭動詞在不同語態中的官方定義，同時也包含著具有對外關係解釋，且同時收錄在朝集類與禮拜類的「來叩頭」*hengkilenjimbi*。其中這一詞指涉來朝覲的對象是受到恩澤的外國之人，而具體的行為則是運用大臣之禮來朝（衙門）叩頭。或許能將這個用語成為固定用語，理解為官方定義皇帝與朝覲者之間的關係，即中國天下體制下對外關係在禮儀方面的體現。

而且可以想見這樣用語將成為同時期朝覲概念的專用語言，比如本節開頭所引，康熙 55 年奉命出使土爾虎特國（即土爾扈特部）的使臣圖理琛所寫下的出使紀聞《異域錄》（*lakcaha jecen de takūraha babe ejehe bithe*）中，則能看到四處將滿文 *hengkileme*（叩頭著）、*hengkilembi*（叩頭）與漢文的「朝覲」對譯的用法，⁸⁸ 或是在乾隆 11 年（1746）《一學三貫清文鑑》以問答的形式，串聯《清文鑑》中的詞條，並附上漢文翻譯，如「或連叩俯伏」*sirame niyakūrafi hengkilmbi, ici hengkišembi* 等等。⁸⁹

不過，在乾隆帝有意推行的新清語運動浪潮下，上述民間原生與早期官方文獻中朝覲用語有所改變。乾隆帝為保持滿語和漢語之間的語言界線，在許多地方推行新清語，創造新詞掃除滿文中的漢文借詞，比如「通事」（從 *tungse* 改為 *hafumbukū hafan*）；以及借用滿語原生詞彙，以對應當下政治或文化事業而發明出新詞彙，比如用來描述官員、使節來朝時排隊順序的「序班」（*faidasi*），則是來源於滿語中排隊、排開（*faidambi*），或是指涉圖譜的詞「譜」（*durugan*）；⁹⁰ 抑或是重新創造滿語詞彙用以翻譯漢文古籍中的名詞，如《獸譜》、《鳥譜》中收錄《山海經》珍禽異獸的名稱；甚至也包含廣義上的文字發明，比如滿洲文字的篆字並用於各級行政單位的鈐印、官印與關防。⁹¹ 在此浪潮下，影響朝覲禮儀詞彙的用語主要是「朝」（*hargašan*）的概念的發明。

在民間用語中「朝」（*hargašan*）的詞跟來源是動詞看見（*hargašambi*），比如《大清全書》寫為遙望、遠望（*hargašambi*）與瞻仰（*hargašambi tuwambi*）等詞彙，⁹² 並且尚未出現與禮儀相關的意涵。直至乾隆朝 17、18 年間，在新清語前

⁸⁸ 本書在雍正元年以滿文出版，在乾嘉年間亦有抄本，抄本部分只有卷首缺乏輿圖，其餘與刊本內容相同；而漢文本則版本較多，彼此之間的差異主要在於人名、地名的訛傳。出自莊吉發，《滿漢異域錄校注》，頁 1-2。本文討論的《異域錄》版本是莊吉發在今西春秋《校注異域錄》，該書以結合久耐堂滿文本與桂岩漢文本的基礎上，進一步整理的《滿漢異域錄校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4）。

⁸⁹ 故宮博物館編，《一學三貫清文鑑》（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723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根據靜宜齋藏版），禮儀類，頁 42a。

⁹⁰ 據筆者悉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賴毓芝副研究員，日前正進行此概念的相關研究。近史所學術會議：重新發明「圖譜（*Durugan*）」：清宮院體與滿洲視野下的「畫」與「圖」。

⁹¹ 林士鉉，〈契約文書中的滿漢合璧印章：以《宜蘭古文書》為例〉，《政大史粹》，4 期（2002，臺北），頁 1-20。

⁹² 《大清全書》，卷二十八，頁 0428a-0429b。

期工程的出版物《增訂清語》中，收錄「朝」(hargašan)一詞。⁹³到了乾隆 36 年出版《御製增訂清文鑑》中，與「朝」(hargašan)的相關用語與註釋開始出現在字典當中，並且取代原先的漢語借詞「上衙門」(yamulambi)用語，比如衙門集類(yamulara isara hacin)更易為朝集類(hargašara isara hacin)。詞條解釋與筆者翻譯如下：

hargašan abkai fejergi tumen gurun geren wang beile ambasa hafasa isafi deyen i baru dorolome hengkilere ba be hargašan sembi.

朝 把天下萬國諸王、貝勒、大臣官員等向殿聚集，行禮叩頭之地，稱作「朝」。

hargašandumbi teisu teisu hargašara be hargašandumbi sembi.

一齊仰望 把各自各自仰望稱作「一齊仰望」。

hargašambi hargašan de isafi dorolome hengkilere faidan tere be gemu hargašambi sembi.

上朝 聚集在「朝」行禮叩頭的隊列，把其皆稱作「上朝」。

hargašanjimbi erdemu wen bireme selgiyebufi abkai fejergi tumen gurun gemu hargašame jidere be hargašanjimbi sembi.

來朝 把德化普遍流傳天下萬國皆來朝稱作「來朝」。

alban jafambi encu gurun i niyalma ceni ba na ci tucire sain jaka be banjime jidere be alban jafambi sembi.⁹⁴

進貢 把異國之人從他們地方出產的優良之物攜來，稱作「進貢」。

在《欽定清語》與《御製增訂清文鑑》中，所增添「朝」(hargašan)一詞，若呼應乾隆帝的語言政策背景，以及當時的政治環境，可以將這組詞彙的出現，一方面可以理解成掃除滿語音譯漢文的政治或禮儀用語；另一方面則是一套象徵專屬清朝話語權下朝覲觀念的體現。在「朝」(hargašan)的解釋中，能見官方定義出天下萬國的政治空間，而施行的對象則是諸王、貝勒、大臣官員，諸王可以理解為外藩或外國的政團領袖，貝勒、大臣官員則是中國政體內以君臣關係聯繫的對象。因此在此的朝作為這些政團領袖向殿聚集行禮叩頭的地方，則是象徵天下萬國政治空間，被構擬在紫禁城之當中的場域。⁹⁵

⁹³ 故宮博物館編，《欽定清語》(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723 冊，根據清代阿恩哈佛德家刻本)，卷之一，二十五 a，頁 255。《欽定清語》的編纂時間，據筆者依據書中角落提及的負責人任官生平，推論成書時間大約在乾隆 17、18 年之間，本書可視為乾隆朝新清語運動的前期工程。

⁹⁴ (清)紀昀、傅恆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32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經部二二六，卷六，禮儀部 朝集類，29a-29b，頁 184-185。

⁹⁵ 關於清代萬國來朝的政治想像如何以圖像化的方式呈現，可參閱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

而從與朝覲相關詞彙的刪改來看，叩頭詞彙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被分類在禮拜類之中，並且原先涉及異國解釋的詞條，則被刪改為單純環繞在叩頭概念的解釋，相關詞條將叩頭視為一種禮儀肢體行為的展現；⁹⁶ 並且，這些用語成為日後《御製五體清文鑑》翻譯其他語言的詞條的基礎。⁹⁷

hengkilembi niyakūrafi uju be na de isibume doroloro be hengkilembi sembi.

叩頭 把跪下後把頭及地之禮稱作「叩頭」。

hengkilebumbi niyalma de hendufi hengkilere be hengkilebumbi sembi.

使叩頭 把使人叩頭稱作「使叩頭」。

hengkilenembi genefi hengkilere be hengkilenembi sembi.

去叩頭 把前去叩頭稱作「去叩頭」。

hengkilenjimbi jifi hengkilere be hengkilenjimbi sembi.

來叩頭 把來叩頭稱作「來叩頭」。

hengkilendumbi geren niyalmai hengkilere be hengkilendumbi sembi.

一齊叩頭 把眾人叩頭稱作「一齊叩頭」。

hengkilenumbi sasa hengkilere be hengkilenumbi sembi.

一齊叩頭 把一齊叩頭稱作「一齊叩頭」。

hengkišembi emdubei hengkilere be hengkišembi sembi.

連叩頭 把頻頻叩頭稱作「連叩頭」。

從字典詞條本身互相指涉的特性來看，筆者推論乾隆帝將「朝」*hargašan* 的概念視作為能夠在對外關係中，代替原先叩頭一詞的概念，並且成為一種相對上位的概念，比如體現在從滿文解釋來看「朝」*hargašan* 的概念相較於叩頭更加的複雜。這點筆者認為可能是乾隆為呼應他所治下的大清國，在對外政治關係達到鼎盛的實際情況，從而將「朝」*hargašan* 視為理想的天下政治格局的表述方式。而在接下來的章節中，筆者將目光放在遠方哈薩克諸部是如何與清朝之間建立關聯，並進一步分析哈薩克方的奏摺文書與此時乾隆朝的概念變動是否相關。

《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 期（2012，臺北），頁 1-76；賴毓芝，〈構築理想帝國：《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的製作〉，《紫禁城》，總 237（2014，北京），頁 56-69。

⁹⁶（清）紀昀、傅恆等敕撰，《御制增訂清文鑑》，卷六，禮儀部 禮拜類，頁 33a-33b。

⁹⁷ [日] 田村實造、今西春秋、佐藤常共譯，《五體清文鑑譯解（上卷）》（京都市：京都大學文學部內陸アジア研究所，1966），頁 132-135；若要觀看《御制五體清文鑑》頁面，可以參考栗林均的線上數據庫，<http://hkuri.cneas.tohoku.ac.jp/project1/kdic/list?groupId=18>。

小結：清代朝覲的概念

本節主要探討歷史中國的朝覲概念，時間跨度從先秦典籍，到正史材料，再到清代官方字典，並進一步藉由滿文辭書中的釋義，釐清清代朝覲概念背後象徵著天下萬國的政治空間。而其中漢文與滿語之間禮儀概念的該如何對譯，不論是叩頭（hengkilembi）與漢文中的朝覲、來叩頭（hengkilenjimbi）的解釋修改與詞彙分類的移動；還是乾隆年間還是新清語運動中「朝」（hargašan）詞條解釋的發明。這些政治與禮儀概念在歷史中動態挪移，則反映清朝在沿用明代政治制度時，並非單純的繼承前朝制度，而是在「參漢酌金」的原則下，選擇性的學習明朝的法律、禮儀制度，與此同時也根據自身的政權統治的需要，對於古代禮儀再詮釋。

康熙 47 年 (1708)	乾隆 8 年 (1743)	乾隆 36 年 (1771)	乾隆 59 年 (1794)
御製清文鑑	滿蒙文鑑	御製增訂清文鑑	五體清文鑑
dorolon i hacin (禮儀類)	dorolon i hacin	dorolon i hacin 禮儀類	dorolon i hacin 禮儀類
		faidan de baitarala jaka i hacin 鹵部器用類	faidan de baitarala jaka i hacin 鹵部器用類
yamulara isara hacin (衙門集類)*	hargašara isara hacin	hargašara isara hacin 朝集類	hargašara isara hacin 朝集類
doroloro hengkilere hacin (禮拜類)	doroloro hengkilere hacin	doroloro hengkilere hacin 禮拜類	doroloro hengkilere hacin 禮拜類
sarin yengsi hacin (筵宴類)	sarin yengsi hacin	sarin yengsi hacin 筵宴類	sarin yengsi hacin 筵宴類
wecere metere hacin (祭祀類)	wecere metere hacin	wecere metere hacin 祭祀類	wecere metere hacin 祭祀類
wecere metere de baitalara jakai hacin (祭祀器用類)	wecere metere de baitalara jakai hacin	wecere metere de baitalara jakai hacin 祭祀器用類	wecere metere de baitalara jakai hacin 祭祀器用類
jobolon sinagan I hacin (喪服類)	jobolon sinagan i hacin	jobolon sinagan i hacin 喪服類	jobolon sinagan I hacin 喪服類
fusure erire hacin (灑掃類)	fusure erire hacin	fusure erire hacin 灑掃類	fusure erire hacin 灑掃類

表二、清宮清文鑑禮儀詞彙收錄分類

三、遣使入覲：乾隆年間哈薩克諸部使節來朝

伊古從來化外躡，間闕馳使遠朝天。
不知中土歲月日，乃隔長安萬二千。
塞野便教預獵喜，山莊旋與錫恩駢。
即今行國多天馬，附會誰窮太史編。



清 乾隆，《御製詩集 二集》，〈哈薩克使臣至，令隨圍獵，并成是什〉

由於戰後中國史學界受到費正清提出的「朝貢體制」學說影響，使許多學者在此框架上分析中國與相鄰政團或民族的關係。然而早期學者忽略中國與內陸亞洲互動經驗複雜性，使得其中的涉及經濟與從屬關係的討論，以朝貢制度簡單歸納成：傳統上，西部和北部的遊牧民族，以馬匹和其他畜產品，作為「貢品」獻給朝廷，換回朝廷給他們的賞賜。儘管這些賜品的價值通常比馬匹本身更值錢，但作為政治投資，為了換取外國人在朝貢儀式上的「順從」，朝廷還另外對這種交易給予額外的補貼。⁹⁸ 而這種雙邊關係基於禮儀上的物品交換，在西方人透過武力洞開中國國門，傾銷大量工業商品之前，形成一套以「朝貢制度」運作的「中國的世界秩序」。在此前中國對外貿易都具有與之類似的特徵。但有許多學者並不同意此說法，⁹⁹ 尤其是米華健指出平準戰爭後，清帝國為應付治理新疆的財政需求，於是與哈薩克開啟熱絡的貢馬互市，試圖彌補財政空虛的問題；並且米華健認為相對於當時學界較少研究的經濟領域而言，清哈之間的禮儀往來算是一種形式上的粉飾。¹⁰⁰

然而，從多次哈薩克諸部遣使入覲的紀載，以及朝覲遭到取消後，使臣被伊犁將軍就地遣回時，臉上「頗有悻悻之色」。¹⁰¹ 以此來看伴隨著朝貢行為的朝覲活動，除了對於哈薩克人來說極為重要之外，此時的清朝又是如何看待遣使入覲的哈薩克諸部。不同中國傳統的封藩體系，清朝在中亞政團間建立的主—客(ejen-albatu)關係，在具體運作上為何，是否涉及哈薩克使節的身分？如若分析哈薩克汗王阿布賚與乾隆之間的外交辭令，與滿文朝覲詞彙的使用，能否進一步回應

⁹⁸ 費正清，《中國世界秩序》，頁 7-8。

⁹⁹ 濱下武志以清朝為例，以中國同心圓五服觀念，疊加清朝實際對於其邊境諸政團之間的經濟互動，形成一幅中心圓圈與四周經濟圈相疊重疊的中國周圍關係圖，用以描述清朝的華夷秩序。見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圖 1-2、頁 8、12。

¹⁰⁰ [美]米華健，《嘉峪關外》，頁 58-63。

¹⁰¹ (清)章甫、賽尚阿等編纂，《欽定回疆則例》(清道光 17 年(1837)刊本)，卷四，〈哈薩克王公台吉等遣子弟來京令赴避暑山莊朝覲〉，頁 17b。

清朝語境下的對外關係與政治關係。因此在本節中，筆者將要透過梳理清朝與哈薩克之間關係建立時，文書往來與使節如何議定商榷，並承接上一章節關於新清語「朝」(hargašan)的問題，進一步探討清代天下制度中哈薩克這一案例的意義。

平準餘波：清朝與哈薩克關係之建立

自乾隆 10 年 (1745) 噶爾丹策零死後，準噶爾渾台吉國發生內亂。¹⁰² 達瓦齊趁亂成為準噶爾渾台吉，然而此舉卻造成準噶爾內部政治的聯盟分裂。乾隆 19 年 (1754)，正值乾隆對準噶爾發動新戰事，曾經是達瓦齊的同盟與輝特部首領的阿睦爾撒納，以及其他準噶爾舊部族投靠清朝。翌年，在一支由滿洲、蒙古 (喀爾喀、察哈爾)、準噶爾、漢與東北地區少數民族索倫人所組織的軍隊下，清朝進軍天山北路。當時的清朝幾乎是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下，進入北疆與進攻伊犁，達瓦齊則是在逃入南疆後被活捉，送往北京。

平定準噶爾後，乾隆帝本計畫要將準噶爾部重新規劃成衛拉特四部，分別由此前歸附的準噶爾部下首領統治，其中阿睦爾撒納是為輝特部的可汗。但阿睦爾撒納並不滿足於此，他向乾隆表示想成為四衛拉特的可汗，甚至私下使用達瓦齊的印信，而非乾隆賜與的將軍印信。乾隆為確定阿睦爾撒納的忠誠，於乾隆 20 年 (1755) 九月命令他前來熱河覲見。在前往承德的途中，阿睦爾撒納成功逃離清朝護衛隊，而他的手下也進攻清朝駐紮北疆伊犁的少量部隊。在伊犁的定北將軍班第，因為沒有獲得駐紮在烏魯木齊的永常援助，最終全軍覆沒，而永常則向東逃回巴里坤。

直至乾隆 21 年 (1756)，清軍再次進軍北疆，且受限情報不明的緣故，使得阿睦爾撒納得以逃往哈薩克，並被當地人隱匿，藉此躲避清朝的追查。清軍在壓制準噶爾人反叛初期的失勢，使得原先歸順的四衛拉特首領也起兵反叛，並依附於阿睦爾撒納，北疆局勢一度失去控制，伊犁再度被準軍攻陷。翌年，清朝又組織更大一批軍隊進行反攻，在乾隆下令大規模屠殺降而復叛的準噶爾人，以及天花肆虐的情況下，準噶爾人「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三，為我兵殺者十之五，數千里內遂無一人」。¹⁰³ 基本上後來支持阿睦爾撒納的衛拉特人，如輝特部與綽羅斯人幾乎被消滅殆盡。而阿睦爾撒納最終病死在俄羅斯境內，他的屍體交還問題，甚至成為一段清朝與俄國之間的外交爭議。¹⁰⁴

¹⁰² 濮德培、莊吉發等學者將準噶爾稱作汗國，而日本學者宮脇淳子則強調準噶部的名號，應稱之為準噶爾渾台吉國，亦即太子國。[日]宮脇淳子，曉克譯，《最後的遊牧帝國：準噶爾部的興亡》(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頁 118、150。而筆者在下文中以準噶爾部、準部為主。

¹⁰³ (清)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三，西域用兵始末，頁 81。

¹⁰⁴ 孔令偉，〈依違於清俄帝國之間：歐亞史視野下的阿睦爾撒納與準噶爾汗國〉，收入陳正國主

而清朝在滅亡阿睦爾撒納統領下的準噶爾汗國時，清朝也陸續和原先跟準噶爾人有所聯繫的中亞政團、部落，建立外交聯繫，諸如一開始與天山北路的哈薩克諸部；或是平準戰爭後的平回戰爭，清朝與天山南路向西的外帕米爾高原上的巴達克山、博洛爾、浩罕等等。尤其次在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的同時，看準風向轉變的哈薩克汗國，正式與清朝之間建立朝貢互市的貿易體系，而其中甚至彼此有使節覲見乾隆帝、外交文書往來、厄魯特逃人刷還等情況。因此，在接下的討論中，筆者將聚焦在滿文檔案中，哈薩克汗王阿布賚與乾隆之間的文書往來，以及使者覲見的相關細節，藉此構建一段哈薩克使節朝覲的實像，並藉由此次朝覲，以及日後哈薩克使節數次朝覲的情況為例，探討清代朝覲制度在中亞政團的運作，以及其背後的歷史意義。

清朝對哈薩克汗諸部的認識

清朝與哈薩克之間的外交關係的建立，得到平準戰爭後期才開始發展。由於此前準噶爾部的存在於兩國之間，因此清朝早期對於哈薩克的印象，大多來自於哈薩克馬，或是輾轉得知的情報。康熙 35 年（1696），出征時的康熙帝曾從準噶爾的噶爾丹手上獲得哈薩克馬，「朕所乘馬，乃係哈薩克國之馬。噶爾丹得之，為我軍所敗，我軍得之。朕乘而試之。其汗如血，古所稱大宛汗血馬，想即此也。張玉書等奏曰。史稱大宛馬為天馬」；¹⁰⁵ 或是康熙 37 年（1698），來自準噶爾汗策妄阿拉布坦奏報與哈薩克頭克汗之間的衝突情報，而從策妄阿拉布坦提及「哈薩克屢來犯臣，有如許過惡，臣是以興兵而往」，¹⁰⁶ 或可推斷此時的哈薩克與準噶爾之間勢均力敵；抑或是康熙曾提及他對於世界地理的認識，其中也包括哈薩克人的風俗土產，「又哈薩克即古陽關地，其人性好鬥，常結隊以殺擄為事，人心亦齊，若婦女被人擄去，其擄去之婦女，必乘間手刃其人而回。此地亦熱，草極肥盛，馬皆汗血。所產蘋果、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¹⁰⁷ 這些資訊有學者指出或許來自土爾扈特人的傳播。¹⁰⁸ 但筆者認為這部分關於哈薩克人的情報，或來自準噶爾人的負面評價。不過，到了康熙 57 年（1718）原先是中亞主要勢

編，《1723，世界史的 11 扇窗：接觸、匯聚與開創，從全球史中的人物，看見現代世界的格局與變化》（臺北：聯經出版社，2023），頁 64-87。

¹⁰⁵（清）溫達等奉敕撰，《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54-35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34，頁 16b，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¹⁰⁶《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188，頁 999a，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¹⁰⁷《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53，頁 505b，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六日。

¹⁰⁸ 孔令偉，“Information Circulation of Eurasian Knowledge between Kalmykia, Tibet, and the Qing Empire”，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12 年度第十三次學術講論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23 年 9 月 18 日。感謝孔令偉教授在本論文口試時，提及康熙對於世界知識並非單一來源，而可能來自傳教士、蒙古人等等，因此這條材料未必只來自土爾扈特人。

力之一的頭克汗逝世，哈薩克汗國從此分裂為大、中、小三個玉茲。¹⁰⁹ 同時，準噶爾汗國勢力的崛起，使其面對中亞政團時，也將猶如入無人之境。

在乾隆帝統治初期，清朝對於哈薩克的認識，大多基於中國古籍當中的西域知識。乾隆 4 年（1740），乾隆帝在與準噶爾議和定界，獲得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進貢的哈薩克馬時，在詩中將哈薩克比作漢代的大宛國。¹¹⁰ 直到清朝與哈薩克諸部之間，因平準戰爭局勢變化，乾隆帝逐漸與之產生聯繫並建立定期的朝貢關係的想法，這點使得關於哈薩克諸部的調查報告能陸續進呈。此時乾隆帝也意識到原先「哈薩克即大宛」乃舊說訛傳，於是更訂古籍中的說法，並判定「哈薩克為漢之康居」。¹¹¹ 甚至乾隆帝在日後針對西域的調查活動中，更為理解中亞地緣政治之實像。¹¹²

總之，從清朝初期準噶爾汗奏言、清大臣奏摺、準噶爾逃人供言、皇帝對於古籍典故的徵引與更訂可見，即是清朝方面或許已知哈薩克汗國擁有較強軍事實力，但自康熙 37 年至乾隆 19 年近五十餘年裡，清朝與哈薩克雙方並未達成通使，清朝對哈薩克內部情形亦缺乏詳細情報。因此，清朝對哈薩克汗諸部的認識，來自平準戰爭後期，清朝與哈薩克諸部逐漸形成的朝貢關係，而這樣的關係形成，則源自於乾隆 20 年（1756）哈薩克諸部政團領袖與清朝之間的使節往來，以及朝覲關係的建立。接著，筆者將以時序的方式，統整清哈關係建立初期的使節往來互動。

清朝與哈薩克諸部朝覲往來始末

由於 18 世紀中葉哈薩克汗國內部的政治情勢，使哈薩克諸部依勢力分為大玉茲、中玉茲與小玉茲的哈薩克諸部，即對應清代官書典籍所指涉的右部哈薩克、左部哈薩克與西部哈薩克。同時，因諸部與清朝間的地理差距、平準實際需求，使得清朝與哈薩克諸部互通使節的時間各有不同。

先是乾隆 20 年（1755），清朝分別遣使左、右部哈薩克。此時的阿睦爾撒納仍未反叛，但遠在伊犁的他，卻開始逐漸佔據準噶爾汗國遺留下的政治遺產，像是此前皆是由阿睦爾撒納負責令其下屬遣使至哈薩克，保持與之的聯繫，並且製造哈薩克預計將出兵的情報，藉此請求兵力支援。但在清遣官員實際調查後，認

¹⁰⁹ 厲聲，《哈薩克斯坦及其與中國新疆的關係》，頁 60。

¹¹⁰ 〈大宛馬歌〉曰：「今之哈薩昔大宛，嶠山神種古所傳。烏孫（指準噶爾）中闕阻聲教，攘為己有曾貢閑。」參見清·清高宗御製，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集·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3-130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83，〈大宛馬歌〉。

¹¹¹ （清）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詩集·三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5-130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86，〈讀史記大宛傳〉，頁 6b-7a。

¹¹² 葉高樹，〈人群與地域：乾隆皇帝對「西域」的認識〉，《歷史教育》，23 期（2021，臺北），頁 53-112。

為「看此情形，明係阿睦爾撒納陰相煽誘」。¹¹³ 於是在清朝派遣使節丹津與左、右部哈薩克諸首領間的直接交涉，並得知左部哈薩克來使阿穆爾巴圖魯等「辭頗恭順」、「既懇入覲」與「阿布賚誠心欵附」。定北將軍班第因此奏稱希望讓阿睦爾撒納與哈薩克諸部一同入覲，為此乾隆則回應：

班第奏聞皇帝：令爾等隨阿睦爾撒納，一同入覲。如此，伊等既知內地將軍權柄所在，而阿睦爾撒納，亦難於阻止。今將來使遣回，聽阿睦爾撒納定議，恐伊未必遣令前來。在阿睦爾撒納初不願哈薩克來使，恭請入覲，而又難於禁止。是以令往班第處定議。今班第仍交阿睦爾撒納辦理，是則墮其術中。殊未允協。嗣後哈薩克如再遣使前來。即徑送入京。¹¹⁴

由此可見，乾隆帝在究竟何人能夠朝覲的問題上，是依照西北局勢緊繃的態勢，試圖剝除阿睦爾撒納與哈薩克左、右部之間的聯繫，並且希望能越過阿睦爾撒納，直接與哈薩克汗國之間建立關係。因此，學術界過往常強調右部哈薩克與清朝之間的交流是在乾隆 23 年（1758），但從這次交涉來看，或可提前三年。¹¹⁵ 不過，清哈雙方在平準戰爭結束後初次通使的時間較早，但卻因阿睦爾撒納反叛而被中斷，直至兩年後左部哈薩克才正式遣使入覲；翌年，清軍在塔什罕城接受右部哈薩克首領阿比里斯集眾來見，阿比里斯便告稱：

我右部哈薩克，久欲歸誠，因被準噶爾隔絕，今聞大兵平定準噶爾，我左部哈薩克阿布賚歸誠。受大皇帝隆恩。又聞布魯特相繼歸附。我等欣聞招撫，情願入覲。因年老不能遠行議遣圖里拜之子卓蘭、輝格勒德之族弟博索爾瑞代往。謹進馬三匹。並叅贊大臣贄見馬一匹等語。隨於備帶緞疋內。分別給賞。¹¹⁶

至此右部哈薩克正式歸附清朝，並在日後多次遣使入覲。而從阿比里斯歸附理由來看，此時歷經平準戰爭清朝，已在西北邊境站穩腳跟，使得西北諸部落政權為安全考量，也相繼與清朝之間建立外交聯繫。甚至在未來距離作為遙遠的西部哈薩克也將遣使來歸。

¹¹³ (清) 傅恆等撰，《平定準噶爾方略》(乾隆 31 年 (1766) 殿本)，卷十六，頁 29a，乾隆二十年七月癸巳至八月辛酉。

¹¹⁴ 《平定準噶爾方略》，卷十六，34a-35a，乾隆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¹¹⁵ 郭文忠，《乾隆時期與哈薩克諸部關係研究》，頁 107。

¹¹⁶ 《平定準噶爾方略》，卷六十一，頁 11b-12a，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七日。

在地理空間上距離清朝最為遙遠的西部哈薩克，其與清朝通使則可以追溯到乾隆 27 年（1762）伊犁將軍明瑞奏稱「左部哈薩克努爾賚，遣使入覲，又有……奇齊玉斯別部之巴圖爾，亦遣使前來，伊等因見右部哈薩克入覲，得霑恩賞，故相率倣倣。念其遠來歸附，自必照例宴賚」。¹¹⁷ 由此可見，西部哈薩克汗王因為右部與清朝的朝貢貿易受益甚多，於是決定歸附清朝並建立朝貢關係。翌年，西部哈薩克首次派使臣烏克巴什頗拉特前往北京朝覲，並獲乾隆帝的敕書：

又賜右部 哈薩克 奇齊玉斯努爾里等敕書曰。汝等仰慕皇風，輸誠表貢，遣使入覲，經駐劄烏魯木齊大臣等奏到朕心嘉悅，已令護送到都，加恩宴賚賜汝等緞疋、綉綾、器什，並賞來使等，翎頂、器什、銀兩，各有差。汝遠在遐荒，未通朝命，聞巴達克山、霍罕各部落、各部布魯特。及鄰近之鄂爾圖玉斯哈薩克阿布賚等，俱已歸附，祇受殊恩，汝嚮風景化，願為臣僕，進貢馬匹，具見悃誠。念汝游牧之地甚遠，初通貢使，賞賚特優。汝受天朝大恩，應謹守法度，約束屬人，和睦鄰封，以期永膺休養，特諭。¹¹⁸

而在此需注意的一點，明瑞所稱的左部哈薩克努爾賚，以及敕書中稱作右部哈薩克奇齊玉斯努爾里，應該為西部哈薩克努拉里，筆者推測大概源於此時西部哈薩克與清朝相距甚遠，清朝方混淆部族的用語。這點在嘉慶年間松筠主持編纂《伊犁總統事略》（該書後被道光帝賜名《欽定新疆識略》）中，有關於西部哈薩克的詳細記載，諸如「哈薩克為古康居國，向以為非也」、「哈薩克其部有三，曰左部；曰右部；曰西部」。¹¹⁹ 其中文句來自於乾隆皇帝對於哈薩克認識的修正，代表隨著清朝與哈薩克往來日深，從中央向下傳遞、滲透的資訊亦更為精確。

但是，若只從清朝官方的記載來看域外政團歸附、遣使入覲的語境，往往只能以猶如倒放電影的方式理解，並將之視為強勢方單向影響弱勢方的過程。因此，筆者想在下節中，著重討論左部哈薩克阿布賚汗王清朝之間建立關係，筆者認為乾隆 22 年（1757），阿布賚正歸附清朝，並建立朝貢關係可以作為準噶爾汗國正式覆滅後，中亞政團與清朝互動的標誌性事件。而且阿布賚與清朝方面之間大量文書檔案往來，則可以與日後屬於清朝官方歷史記述性史料相互比較，進而勾勒清朝與哈薩克之間更加細緻的互動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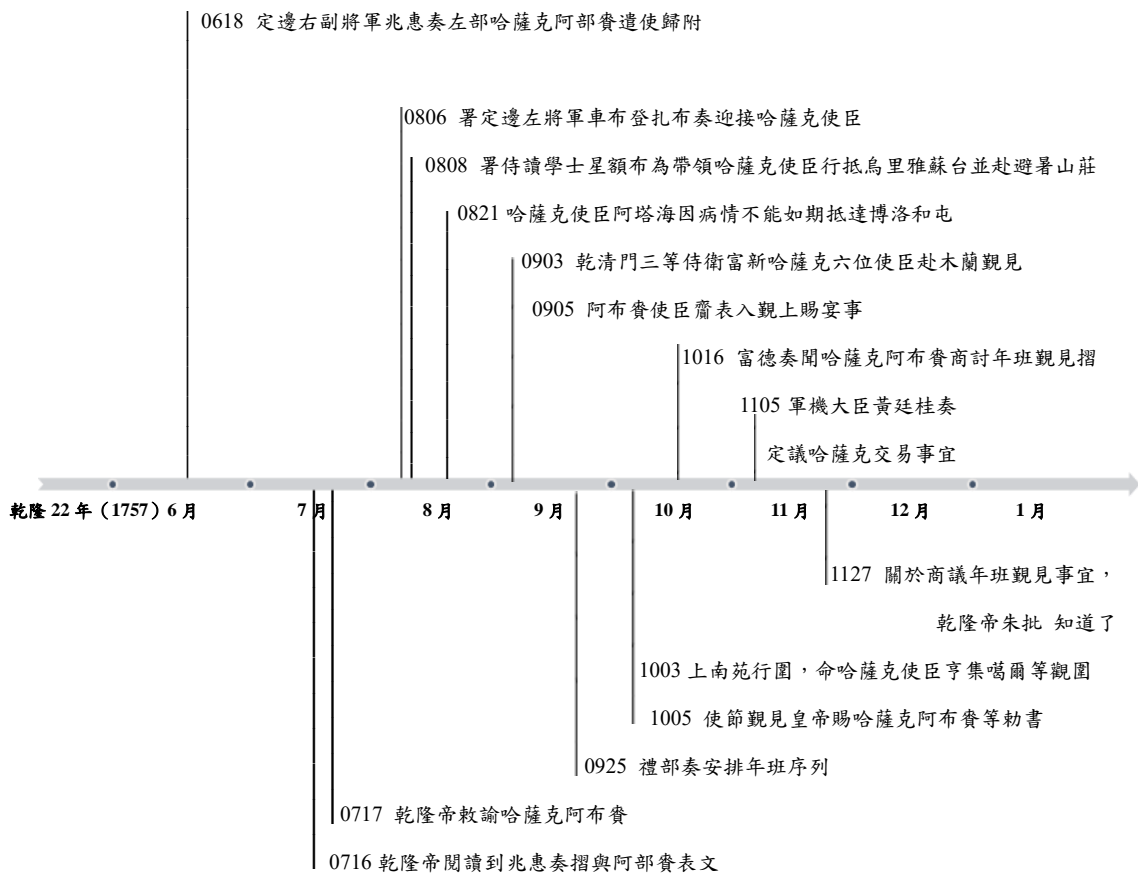
¹¹⁷ 《清高宗實錄》，卷六百七十五，頁 546a，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¹¹⁸ 《清高宗實錄》，卷六百七十八，頁 587b，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

¹¹⁹ （清）松筠編纂，《欽定新疆識略》（收入《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彙編》，冊 19，北京：學苑出版，2006，上海積山書局石印本），卷十二，外裔，〈哈薩克〉，頁 3b-4a。

左部哈薩克汗王阿布賚遣使入覲始末

在進入本節的討論之前，筆者先根據《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清高宗實錄》、《平定準噶爾方略》、《起居注冊》、《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彙編》等材料，依照史料時間順序排列，繪製左部哈薩克在歸附清朝後，首次遣使入覲見時序示意圖（圖一）。該圖可作為釐清本節想要探討清朝與哈薩克建立朝覲互動關係中幾個重要時刻的座標軸。



圖一、左部哈薩克首次遣使入覲時序示意圖¹²⁰

由於早期中文學界中關注哈薩克遣使入覲的學者，基本上都仰賴《清高宗實錄》、《平定準噶爾方略》中節錄的檔案、表文、敕書等材料。¹²¹ 但這類材料在

¹²⁰ 本示意圖取材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著，《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冊24；冊25，頁1、9-10、147、259、27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哈薩克斯坦東方研究所編輯，《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彙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冊1，頁59-70；《清高宗實錄》等。

¹²¹ 厲聲、郭文忠與小沼孝博的研究都有針對關鍵的一手滿文檔案進行討論，不過他們在書中其他部分中，大多數還是先使用漢文官書典籍進行事實的重構；洪濤在其〈評乾隆皇帝的哈薩克政策〉則只使用漢文史料。

被挑選進入至記述性官書時，清朝官方往往是有意識地透過史料挑選，建構出一套符合當下政治局勢的歷史論述，並形成新的歷史記憶；並且涉及入覲事件的材料在歷史現場形成之初，大多數是滿文、托忒文、察合台文等內亞語言。所以如果只使用漢文官書典籍分析左部哈薩克入覲始末，則會忽略漢文語境對於原文語境的曲解；¹²² 同時，依循清朝的官方說法，則容易將「遣使入覲」視為一種結果，¹²³ 從而忽略雙方來回互動的過程中，清哈雙方是如何建立朝覲關係。

因此，在本小節中筆者將藉由依時序論述左部哈薩克與清朝互動的過程，同時筆者將聚焦在阿布賚與清朝之間建立年班朝覲關係的商議奏摺。但在討論之前，仍需意識到滿文奏摺檔案本身是翻譯自察合台文的表文，也會出現語意上的失真。¹²⁴ 但相較於漢文史料，一手的滿文檔案因為同為內亞語言，或可推論在語法、語用上更接近哈薩克汗王阿布賚的原意。

回到歷史現場，即使彼時哈薩克與準噶爾部在內陸亞洲的地緣政治上曾是世仇，但阿睦爾薩納靠著與左部哈薩克諸部首領建立良好的關係，如「頂佛而誓，銜槍設盟」，¹²⁵ 或阿睦爾撒納其實是阿布賚的女婿等。¹²⁶ 以上幾點則讓他能從乾隆 21 年（1756）春，清朝出兵試圖追捕以來，透過哈方對清朝隱瞞與他相關的情報，或是哈薩克部在面對清朝的要求陽奉陰違、虛與委蛇與暗中包庇，¹²⁷ 於是阿睦爾撒納屢次成功躲避清朝的追捕。不過，時至乾隆 22 年（1757）六月，在清軍持續的剿滅下，準噶爾的勢力在天山南北路幾近消滅，以其此前清軍逼近哈薩克，這才使得阿布賚對清朝的態度有所明朗，因現實考量倒向清朝一方，與兄弟商酌後向清朝提出歸附，在《平定準噶爾方略》如下記載：

阿布賚云：我係為首之人。自應主張。我等自祖父來。未能受中國皇帝恩典。今情願將哈薩克全部歸順。永為大皇帝臣僕。隨具表文。並進馬四匹。遣使亨集噶爾等七人入覲。又遣使送馬。云、為臣等賀禮。¹²⁸

¹²² 郭文忠強調漢文方略等記述性史料，與實際的滿文史料之間的差異。參見郭文忠，《乾隆時期與哈薩克諸部關係研究》，頁 175-193。

¹²³ 洪濤，〈評乾隆皇帝的哈薩克政策〉，頁 24-30。

¹²⁴ 郭文忠、小沼孝博皆針對滿文語境與察合台文語境之間的差異進行討論，尤其強調可能是筆帖式在翻譯察合台文成滿文時，有些詞彙的格位誤植，導致語意上的變動從而影響漢文史料。像是滿文直譯作「阿布賚，我子」這個用法，應該是「阿布賚我願成為大皇帝您的兒子」等等。參見郭文忠，《乾隆時期與哈薩克諸部關係研究》，頁 175-193。

¹²⁵ 《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25，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等奏聞努三會見阿布賚並曉諭擒拿阿睦爾撒納情形折〉，第 389 頁。根據回俗口銜鳥槍設盟。轉引自 吳阿木古冷，〈1755-1758 年間阿睦爾撒納與哈薩克阿布賚汗關係考〉，頁 8。

¹²⁶ 厲聲，《哈薩克斯坦及其與中國新疆的關係》，頁 92。

¹²⁷ 吳阿木古冷，〈1755-1758 年間阿睦爾撒納與哈薩克阿布賚汗關係考〉，頁 11-12。

¹²⁸ 《平定準噶爾方略》，卷四十一，頁 21a-21b，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

而這段文字在《清高宗實錄》中與之相呼應的部分則是：

哈薩克小汗臣阿布賚。謹奏中國大皇帝御前。自臣祖額什木汗，揚吉爾汗以來，從未得通中國聲教。今祇奉大皇帝諭旨。加恩邊末部落。臣暨臣屬。靡不歡忭，感慕皇仁，臣阿布賚。願率哈薩克全部。歸於鴻化。永為中國臣僕。伏惟中國大皇帝睿鑒，謹遣頭目七人，及隨役共十一人，齎捧表文。恭請萬安。並蘇備馬匹進獻。謹奏。¹²⁹

《方略》跟《實錄》的內容詳盡程度不一，或可推斷《實錄》使用的材料應該更接近原始檔案。不過，這兩份材料皆指向左部哈薩克歸附清朝，也能從中看出阿布賚早已為日後遣使入覲進京做準備。而當這份表文隨同新疆的定邊右將軍兆惠在6月18日所寫的奏摺，一起於當年7月16日呈覽給乾隆。翌日，乾隆帝便發下一份滿文敕諭，全文轉引如下：

命以哈薩克歸降，宣諭中外

上諭大學士曰：定邊右副將軍兆惠、參贊大臣富德奏稱，哈薩克汗悔過投誠，稱臣入貢（遣使至營，情辭懇切，現在護送進京）等語。哈薩克一部，素為諸厄魯特所畏。去歲逆賊阿睦爾撒納逃竄往投，我師追入其境，阿布賚率部落遠徙（數十裡）。旋欲縛獻阿逆以贖罪，為賊所覺，遂遁回準噶爾（乘噶勒藏多爾濟、巴雅爾等滋事之際，復肆鴟張，及大軍復入伊犁時，噶勒藏多爾濟已為其侄扎那噶爾布所害，而扎那噶爾布又為阿睦爾撒納所襲）。今兆惠等率師進剿，擒獻叛賊巴雅爾（及其妻子、部眾悉心擒獲），則逆賊游魂，豈能久逃斧鉞耶？況賊所藉以虛張聲勢者，惟（恃）一哈薩克（耳）。今已歸降，願擒賊自效，則益無所恃（此一大關鍵也），朕心為之欣慰（哈薩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國。昔漢武帝窮極兵力，僅得其馬以歸。史冊所傳，便為宣威絕域。茲乃率其全部，傾心內屬）。此實上蒼福佑，列祖鴻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統之盛。然外間無知者流，必又謂其不可深信，而以阿睦爾撒納、巴雅爾等已降復叛（勞師費帑，至今未已）為辭，不知哈薩克越在萬里之外，（荒遠寥廓，今）未嘗遣使招徠，乃稱臣奉貢，（貢獻馬匹，）自屬本願。則歸斯受之，不過略示羈縻，如安南、琉球、暹羅諸國，俾通天朝聲教而已，並非欲郡縣其地，張官置吏，亦非如喀爾喀之分旗編設佐領也。即準噶爾初歸時，亦只分四衛喇特，令自為理（朕前作太學碑文，已具見大意）。而伊等（自棄生成，）屢作不靖，（亦準噶爾諸部之貪殘狡詐，惡貫滿盈，

¹²⁹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543，頁 892b，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獲罪於天，合有此番殺劫，不能承受太平之福。且既已受號稱臣，豈容置之不問，是以奉行天罰。哈薩克自非準噶爾近接西陲可比。若謂準噶爾之事，本不當辦，則尤不知事理者。夫編氓子孫，尚期析薪負荷（肯堂肯構。為克承先志），況以兩朝未竟之緒，而適值可乘之機，乃安坐而失之，使天下後世傳為遺憾，則朕亦何以上對皇考在天之靈耶？況如阿睦爾撒納初來時，若拒而不納，伊（其肯甘心返轡耶），必將蹂躪我喀爾喀，饜其劫掠而後已。從前所降諭旨甚明。乃今春南巡時，有江南監生張汝霖、浙江訓導章知艱，安請從軍摺內，有損兵折將之語。夫草野訛傳，本不足論。然此等妄徒，何嘗有忠君愛國之心，不過逞其幸災樂禍之口。而天下之大，其無知而造言者，（可見）正復不少（我兵自前次平定伊犁以來，未嘗不屢有剿殺，非所謂驅之鋒鏑之間，使膏塗草野而不恤也）。試思以從古不入版圖之地，定之於三五年間（此亦神且速矣），安能保其必無一二受傷之人（耶）。況所用之兵，皆我八族、索倫（子弟之眾），初未嘗徵發閭左，調集耕耜，如杜甫所哀《垂老》《無家》《新婚》諸詠。至現在軍需，較之雍正年間，所費才十之三四，而各省偏災之獨賑（動逾數百萬）、河工之動撥、（宿逋之蠲免，戎行之經費，與）一切經費賜賚，何嘗因此而少減，且視昔有加焉。較之前代以來用兵而增稅捐俸者，為何如耶？朕初非惡逸好勞，窮兵黷武，必以此事侈誇遠略（也），特以國家大事無過於此，而因勢乘便，正為長顧遠慮，息事寧人之計。若以光武之不納鄯善、車師，為人君盛節，不知彼時內亂未靖，安有餘力他圖？若可為之時，光武亦必為之。而可與本朝全盛之時相提並論耶？總之，阿睦爾撒納一日不獲，則邊陲一日不寧；而阿布費即降，則逆賊不患其不獲；逆賊即獲，則準噶爾全局可以從此奏功矣。著將哈薩克（汗）阿布費降表翻譯，宣示中外，並將此通行曉諭知之。¹³⁰

上文所引的敕諭與乾隆 31 年（1766）形成的記述史料《平定準噶爾方略》，書中所節錄翻譯滿文後漢文文書相比，並沒有像此前普遍帶有要求阿布費協助追捕阿睦爾撒納的語氣，並在修辭上提及哈薩克最終選擇朝覲清朝，以及強調哈薩克遭受阿睦爾撒納蒙騙。如「爾阿布費恭順天朝，從前遣使請安，具見誠悃，亦因逆賊中途阻止，未經入覲」；¹³¹「逆賊窮蹙奔竄。入爾哈薩克境內。大兵臨爾部落。

¹³⁰ 本文轉引自郭文忠對比《清實錄》與《平定準噶爾方略》的內容而成，括弧內容是《清實錄》本所收錄的部分。參見 郭文忠，《乾隆時期與哈薩克諸部關係研究》，頁 195-197。同時，郭也指出本敕諭最早應為滿文本本檔案滿文檔案，筆者認為應該就是《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第 24 冊，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乾隆帝敕諭哈薩克阿布費〉。但礙於時間筆者未能實際與郭的版本進行滿、漢文本的相互比對。

¹³¹ 《平定準噶爾方略》，卷二十五，頁 31b，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一日。

特為追擒逆賊一人。於爾部原屬無涉」；¹³² 以及「諭以天朝與哈薩克，本無嫌隙。因阿逆叛亂。逃入爾境。爾等反為所愚。出兵抗拒。是以有干征討」等等。¹³³

取而代之，則是乾隆帝強調這場戰爭本不該發生，且與哈薩克之間也沒有理由接觸「哈薩克自非準噶爾近接西陲可比。若謂準噶爾之事，本不當辦，則尤不知事理者」，但事與願違，阿睦爾薩納的反叛改變這一局面；同時，乾隆帝也反駁這場平準戰爭，並無臣子聲稱的經濟、窮兵黷武等問題，相反卻是師出有名，並且相較於賑災的花費，平準戰爭可謂是相當實惠。最後，乾隆在敕書中也為迎接這場歷經康雍乾三代的清準戰爭尾聲做好準備，尤其是提及哈薩克在西北疆域的實際意義，即「阿睦爾薩納一日不獲，則邊陲一日不寧；而阿布費即降，則逆賊不患其不獲；逆賊即獲，則準噶爾全局可以從此奏功矣」。並且已經準備開展哈薩克遣使入覲朝貢的相關事宜，「哈薩克汗悔過投誠，稱臣入貢（遣使至營，情辭懇切，現在護送進京）」。

從本節開頭的示意圖（圖一）來看，哈薩克使節朝覲行程從 7 月前往熱河到 10 月離開北京，其中使節在京活動大約為期一個月。9 月 5 日，亨集噶爾等使節們抵達承德避暑山莊並齎表入覲後，便受到乾隆帝的賜宴款待，數日後受邀在萬樹園觀看健銳營兵馬伎與煙火。¹³⁴ 乾隆回宮後於 10 月 5 日接見使臣們朝覲，而實錄對於這件事的記載只有提及當日乾隆帝「御太和殿，受哈薩克使臣亨集噶爾等、琉球國使臣馬宣哲等朝」，¹³⁵ 但從若在起居注冊中，則能看到早在 9 月 25 日，禮部為安排首批哈薩克使團與琉球國使臣覲見行禮的班位請旨時，乾隆帝下旨「哈薩克使臣，在琉球國使臣前行禮」，¹³⁶ 即讓哈薩克使節的排序移到琉球使節之前，這些層面皆從側面體現，乾隆帝對來自遠方的哈薩克使節朝覲的重視。

哈薩克與清朝之間的關係，除了名義上外使入覲之外，還有在中亞政治傳統中的主子與僕人的關係，亦即主—客（*ejen-albatu*），亦有學者指出此時的哈薩克對清朝自稱願成為大皇帝的兒子。這些稱呼關係的討論，大多立基於敕書、表文等官方書面用語，並透過多語言比較的方式，推斷各自語境中的對於彼此關係認知上的差異；同時，或許是清朝官方在編纂方略或實錄時，較少收錄商議朝覲活動細節等緣故，使得學者在討論清哈之間建立年班朝覲的過程。因此，筆者將透過滿文奏摺翻譯，探討乾隆 22 年 10 月 16 日，首次朝覲使團準備離京後，左部哈薩克汗王阿布賚透過富德向清朝官方商討日後朝覲的規範，並且藉此與日後朝

¹³² 《平定準噶爾方略》，卷三十二，頁 22a，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二日。

¹³³ 《平定準噶爾方略》，卷四十一，20a，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¹³⁴ 《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彙編》，頁 62-63。

¹³⁵ 《清高宗實錄》，卷之五百四十八，頁 976b，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五日。

¹³⁶ 《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彙編》，頁 69-70。

覲使節與禮典紀錄的內容相互比較。滿文奏摺轉寫翻譯全文請參閱附錄一、〈參贊大臣富德奏聞與阿布賚商定輪班覲見情形摺〉，在此翻譯節選如下：

(前略)惟爾等哈薩克，給大皇帝請安。若有欲親自前去者，便親自前去；把代替親自的子弟，作為使臣差遣著也。若有使臣奉差，我們的將軍、大臣向大皇帝(主子)聞奏，讓你們聽聞，把皇帝的恩領受等語。上諭請依議欽此。查阿布賚先前去向，阿布賚與我們商議辦理。今俱以我們的名聲向大皇帝(主子)奏了我們的意圖，我們的使臣亨集噶爾等前來了後，雖然我親身不得去，但若把子遣去會見了，子非常年幼不能前去。又，我的子弟蘇勒統等統領巴圖魯等在內，如何把主子的英明來前去朝覲之利益。大臣等同我等商議辦理，已於我們言說了。阿布賚，你向大皇帝(主子)歸附之理，若前去親自朝覲甚好也。子又年幼不能前來，把依順序你的子弟之內派遣著吧。在十幾個蘇勒統統領四十四位巴圖魯等之內，怎樣地編排三、四班的生身等，若不能前去則同輩眷屬矣。把弟子遣去著，沒有子弟則可以同輩眷屬，皆成使節差遣也。若是如此，則接續全部，如能獲得把主子的英明來朝覲，可也。

(中略)阿布賚對此非常喜悅，(阿布賚)臣等共前去把主子朝覲，把尺寸數額議定。惟我們哈薩克、蘇勒順等游牧，很難說是一地，如果今把此輩不使通知的名諱寫下，到了時候則有違背著的項目。因此，我們心意在路遠人少，很難行到。蘇爾統之內我的子弟、二人等把統領巴圖魯等四十四人，將年班變成兩班，一年班各由兩位蘇勒統分統領二十二巴圖魯，請前去把主子來朝覲(中略)把來主子的英明來朝覲，並請發遣大(烏拉)玉茲、小(奇齊克)玉茲汗王、蘇爾統、使臣遣來於此，亦一同與這些人發遣等情。與阿布賚共同議訂定例人數額、牽馬人數目，把要緊的以托忒文字寫下領去。將如此遵從，毋庸另行辦理。雖然哈薩克容貌相似，但若看著，把規定事例定配對著，則不能不可行事。將軍、參贊大臣的照樣交付。把主子來朝覲眾多，重恩來到，欽此。¹³⁷

¹³⁷《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26，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富德奏聞哈薩克阿布賚商討年班覲見摺〉，頁 244-246。上述筆者轉寫：(前略) damu hasak sede suwe amba ejen i elhe be baime. beye geneki serengge bici, beye gene. beyei funde juse deote be unggiki elcin takūraki serengge. bici elcin takūra meni jiyanggiyun ambasa amba ejen de donjibure wesimbufi suwembe dosimbufi. ejen i kesi be alimbi seme. hesei tacibuha songkoi gisurekini sehebi. baicaci abulai genere ongolo abulai meni baru hebeSeme icihiyahangge te meni gebu be gemu amba ejen de wesimbuhe mini gūnin de. meni elcin henjigar se isinjiha manggi. mini beye bahafi generakū bicibe, jui be unggici acambihe. jui umesi ajige geneci ojarahū. jai mini deote solton se dalaha baturu se dorgi adarame. ejen i genggiyen be hargaSame geneci tusa. ambasai baru hebaSeme icihiyaki sehede meni gisurehengge. abulai si amba ejen de dahafi giyani beye hargaSame geneci umesi sain bihe. jui geli ajlge geneci ojarahū be dahame sini deote i dorgide unggiki ombi. juwan udu solton dalaha dehi duin bature sei dorgide aici ilan duin idu banjibufi beye eshun sede oho geneci ojarahū urse oci. deote juse be unggire. deote juse akū urse oci. elcin takūrara oci geme ombi, uttu oci siran i gemu bahafi ejen i senggiyeng be hargaSaci

這份奏摺顯示清哈雙方商定的使節代表，應以汗王阿布賚的兄弟或同輩親屬為主，並且試圖禁止非親戚的使節入覲，而這點也與下一節將分析筆者基於厲聲從《實錄》、《方略》整理出來表格，與附錄二中，由筆者重製的〈表三、乾隆年間哈薩克諸王公遣使入覲表（1757年至1795年）〉所記載的使團成員的身分相合。並且此時的乾隆帝將此次與左部哈薩克阿布賚商議的結果，訂為當時仍未前來朝覲的哈薩克西部、右部事務的準則。而這份材料作為歷史過程的一部分，即是代表清朝官方是有意識強調哈薩克諸部王公與清帝之間的聯繫，形成一種類似擬親屬關係，乾隆帝清朝作為父親，應當照顧來自身為「遠方的子」哈薩克諸部王公及其子弟。

而若從清代官方編纂史書或政書的角度，這份涉及禮儀細節奏摺，卻未出現在《實錄》、《方略》等官書中，即使有在《大清會典》等政書中提及子、弟等字詞，但卻沒有強調是清朝方面要求哈薩克諸部該如何派遣。這種記述上的缺席，或許可以跟日後清朝官方試圖塑造關於清哈關係的歷史記憶，尤其在漢文官書當中，以哈薩克處於有待教化、誠心向化論述，取代原先清哈交往初期哈薩克作為歷史行動者的定位。筆者認為這與清朝一方面想藉由歷史記憶，建構哈薩克歸附的從屬地位；並著力強調哈薩克受到清朝宣威教化，最終將歸附於清朝的政治關係；同時在朝覲制度中繼續維持君臣的關係。

另外，若在這份滿文奏摺使用的滿文詞彙中「把主子來朝」*ejen be hargašame*的詞彙用語，則符合第三章筆者透過《清文鑑》系列比對出來的結果，相較於康熙年間的圖理琛向俄國官員或土爾扈特人探討「朝覲進貢」的文句，使用來叩頭 *hengkilenjimbi* 一詞對譯「朝覲」，如 *erdemu be hukšeme yooni yamulame hengkilenjimbi, elcin takūrafi alban jafanjirangge umesi labdu*，後來譯為「來享來王，其遣使進貢朝覲者甚眾」。¹³⁸ 由此可推斷此時的派駐邊疆接待遠人的官員，已經有意識地使用乾隆帝發明的新清語「朝」*hargašan*，描述當前的域外使團朝覲或遣駛入覲這一事情，像是文句中反覆使用「把主子來朝」或「大皇帝來朝」。

ombime (中略) abulai umesi urgunjeme uttu oci ambasa emgi ejen be hargašame genere urgen i ton be hebešeme toktobuki. damu meni hasak sol son i nuktehebi. emu obume gisurere de mangga. te esede ulhiburakū gebu be arafi baci. nergin de isinha manggi jurcenjere hacin bi. uttu be dahame, mini gūnin de jugūn goro komso niyalma yabure de mangga. solton i dorgi. mini deote juwe niyalma be dalabufi batura se dehi dūin niyalma be juwe idu obufi emu idu de juwe sol ton, orin juwe dalaha bature be ejen be hargašame unggiki. (中略) ejen i genggeyen be hargašame unggiki. uluyus kesiyus hañ solton elcin unggihe eride. inu, ese sasa unggiki seme. abulai emgi gisureme toktobufi niyalma ton kutule ton be ambulai tot hergen arafi gamaha. uttu be dahame, encu icihiyara be baiburakū gese bicibe, hasak banin be tuwaci toktobuha baita be urunakū acabume yabumbi seci ojurakū ofi. jiyanggiyūn hebei amban i afabuha songkoi ejen be hargašame geren, ujen kesi isibumbi sehede (下略)。

¹³⁸ 莊吉發，《滿漢異域錄校注》，頁137。至於書中其他部分礙於篇幅限制，在此只附上頁數，如頁263、303、385等。

四、哈薩克諸部的朝覲禮儀實踐

○三十八年。哈薩克 阿布賴、遣子阿第勒素坦來京。時遇次年元旦行禮。奏准入於蒙古公之次。回子公之前。其同來瑪木克等十五人奏准入於三品官之末行禮。

……

○五十一年 哈薩克 杭和卓之弟阿噶岱來京。奏准入於蒙古公之次。回子公之前、行禮。其同來嘉拜等入於三品官之末。

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二百三十六，〈班位〉，頁 12b、13b。

當朝覲活動成為清哈關係的慣例之後，基本上為維持彼此之間的聯繫，每隔幾年時間哈薩克諸部汗王就會遣使來京，沿著貢道從通過哈密後一路到嘉峪關，再進一步依照皇帝當時的行程往承德，或是北京前行；同時，哈薩克使臣與參與年班或圍班回部伯克一同朝覲皇帝，並由內務府掌儀司負責接待，基本上與回子享受同等待遇。¹³⁹ 而使節的身分，如同上節討論的檔案，清朝方面早已要求哈薩克遣使方必須是哈薩克汗、蘇勒坦，或其近親等統治家族成員，亦即「子弟」juse deote。不過隨著哈薩克遣使不斷，甚至出現個別頭目「為得賞物假借阿布賚之名派遣使臣」的情況時有發生。¹⁴⁰

哈薩克諸部汗王子弟入覲

從文末附錄二的〈表三、乾隆年間哈薩克諸王公遣使入覲表（1757 年至 1795 年）〉分析哈薩克諸部來使的情況。首先從年份來看，乾隆 22 年到 56 年共計 34 年之間，有哈薩克諸部來使的年份有 26 年，諸部總共計次 29 次。諸部當中以左部哈薩克遣使次數最多，共 22 次，其中阿布賚在位 24 年中，共遣使 12 次，其餘次數早期由阿部賚其弟們阿布勒巴木比特、阿布勒比斯等負責。直到乾隆 47 年（1782）由後來被乾隆敕封為汗王的阿布賚之子幹里蘇勒坦負責遣使入覲。在幹里蘇勒坦派遣的使團中，也包含為慶祝乾隆八旬大壽的阿彌載使團，當時各部「呈請明年萬壽慶典，於伊等子弟內，各遣一人來京叩祝」。¹⁴¹ 此外，若將阿布

¹³⁹ 何新華，《最後的天朝：清代朝貢制度研究》，頁 96-97。

¹⁴⁰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第 3 冊，第 499-500 頁；第 7 冊，第 768 頁。轉引自英卡爾·巴合朱力，〈乾隆朝接待中亞各部朝覲使團之禮儀及其效用〉，頁 53。

¹⁴¹ 《清高宗實錄》，卷一千三百四十，頁 1170a，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五日。

賚入覲的次數 12 次，與一位蒙古王公一生可能會進京覲見的次數 14 次相比，¹⁴² 可見阿布賚與清朝關係之親近。

不同於英國或俄國等歐洲國家派遣的使節，因為覲見禮過程中的三跪九叩禮，所引發的禮儀之爭，尤其是英國人將跪拜禮視為一種女性化、奴性身體，或是迷信拜神的表現。¹⁴³ 哈薩克等中亞諸政團在面對叩拜禮並未如此抵觸，反而欣然接受。這或許跟內亞政治傳統相關，像是入關前蒙古諸王公跟皇太極強調自己堅持行跪拜禮，「如在我們的地方，應該抱見。但現在慕汗而來，為汗之民。若不向汗叩頭，就不合道理了」；¹⁴⁴ 抑或是有學者指出「遵行叩拜禮並不複雜，因為在東方國家向汗跪拜是平常事」，這也是為何哈薩克朝覲使團成員的貝德爾·尼格瑪托夫，在向俄國官員談及使團被清朝皇帝召見，以及如何被款待與蒙賜何種禮物時，未提起跪拜禮這一尋常之事。¹⁴⁵

對清朝而言，朝覲儀式中的三跪九叩禮，以及下一章要探討的班位安排，這些將身體當作符號或媒介的展演行為，可視為權力與親疏關係的體現。¹⁴⁶ 一般來說，哈薩克使節朝覲見皇帝的流程，大致上與乾隆 24 年（1759）的覲見活動類似。當時乾隆帝在正大光明殿接見哈薩克使臣：

設儀仗，上御正大光明殿升座。哈薩克阿布賴所遣使臣俄羅斯蘇爾統等朝見，行三跪九叩。禮畢，命坐，賜茶出。是晚，於山高水長賜觀火戲。¹⁴⁷

在朝覲禮結束後，多有賜茶、在圓明園山高水長觀看煙火。這些活動使得使臣有機會能與清帝近距離接觸交流。像是乾隆曾對中亞政團派遣的使節，如浩罕、巴達克山、布魯特及博羅爾「命坐賜茶，召至御座前，親加慰問」。¹⁴⁸ 而在乾隆 29 年（1764）時，乾隆帝便對前來覲見之使臣亨集噶爾「溫語慰勞」。¹⁴⁹ 朝覲場合也成為清朝處理對哈事務的場合，像是 27 年（1762），乾隆發現使臣阿塔海竄改

¹⁴² 李治國統計典章規範，假設一位蒙古王公從 18 歲開始參加賓禮活動，至 60 歲逝世，在其 42 年的賓禮實踐生涯中，他年班朝覲進京的次數為 14 次。李治國，《清代藩部賓禮研究》，頁 90。

¹⁴³ 何偉亞，《懷柔遠人》，頁 65-103。

¹⁴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舊滿洲檔譯註·清太宗朝（一）》，頁 190，天聰元年七月初五日（《舊滿洲檔》頁 2689）。轉引自尤淑君，〈從汗國到帝國〉，頁 96。

¹⁴⁵ [哈]克拉拉·哈菲佐娃，《十四—十九世紀中國在中央亞細亞的外交》，頁 83-84。

¹⁴⁶ 孫啟仁，〈清初滿族跪拜禮簡述〉，頁 207-218；關於禮儀與身體背後原理與經典詮釋的研究可參閱甘懷真，〈中國古代君臣間的敬禮及其經典詮釋〉，《臺大歷史學報》，31 期（2003，臺北），頁 45-75。

¹⁴⁷ 《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彙編》，頁 212-213。

¹⁴⁸ 《清高宗實錄》，卷六百四，頁 786a，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

¹⁴⁹ 《清高宗實錄》，卷七百六，頁 891b，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

表章內容，在敕諭中提醒阿部賚該如何處裡；¹⁵⁰ 或是 33 年（1767），由於阿布勒比斯之子卓勒齊，年齒尚幼，還遠來瞻覲，因此乾隆帝要求圖中的地方要員務加意照料，才能展現體卹外藩之意。¹⁵¹

除此官書典籍的紀載之外，乾隆的御製詩也記載許多使臣朝覲受到清朝的熱情接待，以及使節爭相想要來朝等等，即反應清哈雙方的關係在朝覲這一禮儀的場域是如何體現。¹⁵² 像是本章開頭的〈哈薩克使臣至，令隨圍獵，並成是什〉，或〈萬樹園宴哈薩克使臣，詩以紀事〉、¹⁵³ 又或是〈九月十五日賜哈薩克使臣觀燈火〉，¹⁵⁴ 其中〈熱河啟蹕還京即事〉還提到「哈薩克使臣求隨蹕至京師，許之」。¹⁵⁵ 而在前文提及的使節阿布賚的侄子俄羅斯蘇爾統入覲時，寫有〈填倉日命哈薩克人觀燈火〉：

委羽來經五月程，上元盛典值都城。
得教餅節觀燈火，爲示懷柔洽眾情。
陪臣數已較前多，更見親支遣洛那。（俄羅斯蘇爾統爲阿布賚汗之姪，在其台吉中分最親，因專遣朝覲）
邀賞慢須惜繁費（來人多則賞物多，外夷見小，習氣皆然），古來服遠幾經麼。
化城蜃閣無邊幻，翠火明燈依舊新。
亦有花翎曾至者，解稱兩度沐恩人。（陪臣內有伯克訥者，前年入覲得邀寵章之錫，今再至即戴所賜花翎，意殊自喜，示榮侶伴）
虹光百道燭層霄，信有龍門婪尾燒。
漫誚重儻增頓置，上元屈指纔（去聲）旬朝。¹⁵⁶

在這首詩中，可以明顯看到乾隆帝對於多來朝覲的使節的態度「邀賞慢須惜繁費，古來服遠幾經麼」，並強調「來人多則賞物多，外夷見小，習氣皆然」，這樣外夷為了賞物，所以多派人而來的習氣；同時也提及使節伯克訥，因為連續兩次來朝，

¹⁵⁰ 《清高宗實錄》，卷六百六十，頁 389a-309b，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十日。

¹⁵¹ 《清高宗實錄》，卷八百五十二，頁 1203b，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¹⁵² 周軒，〈從乾隆帝西域詩看新疆與中亞之關係〉，《西域研究》，2 期（2012，烏魯木齊），頁 30-37。

¹⁵³ 萬樹丹青豔霽霜，秋陽送暖似春陽。多須深目遵典屬，鄂畚槎舁歸職方。耀武未煩貳師李，窮源底藉鑿空張。近安遠服休稱慶，益勵吾心敬不遑。出自《乾隆御製詩》二集，卷七四。

¹⁵⁴ 九瀛一合貴山朝，火樹依前絳蠟燒。可識仙莊原月宇，只疑鹽澤接星橋。霜林葉落還裝葉，霞嶠標藏重建標。惠遠行時詎尋樂，謾稱預節賞元宵。出自《乾隆御製詩》二集，卷七四。

¹⁵⁵ 習武柔遐以次行，駢驂六御啟歸程。雲莊慢自留清戀。麥坂旋因閱宿耕，駝圖每嫌野渡冷，馬臚還趁暖曦晴。觀光率可從人願，宛使何妨携入京。（哈薩克使臣求隨蹕至京師許之）出自《乾隆御製詩》二集，卷七四。

¹⁵⁶（清）清高宗御製，《御製詩文十全集》（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卷十三，平定回部第四，〈填倉日命哈薩克人觀燈火〉，頁 14b-15a。

並且能夠展示之前從乾隆獲得賞賜，而感到榮耀，「今再至即戴所賜花翎，意殊自喜，示榮侶伴」。這點即能代表朝覲制度對於哈薩克等中亞政團是件可以自豪之事。

在乾隆 52 年（1787）八月，乾隆帝寫下〈左部哈薩克瓦裡蘇爾坦遣其弟哈斯木入覲，於山莊萬樹園錫宴，因成是什〉：

貴山右部使方迴，左部今隨遣弟來。（上年冬新襲右部哈薩克王汗和卓，令其弟阿哈岱來朝。因命於新正隨年班蕃部等，一體入宴後，遣歸。茲左部哈薩克汗瓦里蘇爾坦，亦令其弟哈斯木入覲，恰值中秋萬壽慶辰。即於山莊之萬樹園特錫宴賚，以示柔遠之意）

似此爭思効勤耳，可能漠視沛恩哉。

中秋節恰慶辰值，萬樹園仍錫宴開。

遠域猶然知嚮化，臺灣何事逆民脛。（臺灣久隸版圖，食毛踐土，已百有餘年，乃逆匪林爽文等竟興邪教，肆其鴟張，奸頑梗化，正籌勦洗）¹⁵⁷

這首詩算是乾隆帝結合當時國內政治局勢，藉題發揮的詩。此時正值中秋萬壽誕辰，剛好右部哈薩克使節返回後，左部哈薩克旋即遣使入覲，「貴山右部使方迴，左部今隨遣弟來」。這點被乾隆詮釋為哈薩克左右部都願意爭先恐後朝覲清朝，進而對比處在遠域的哈薩克，都能知道嚮化，反倒是鄰近的臺灣島上的逆賊林爽文，因邪教起事，是多麼地荒唐且無理取鬧「遠域猶然知嚮化，臺灣何事逆民脛」。

入覲序班的身體與落在會典的筆

在歷史中國最能彰顯禮儀本身的事物，莫過於王朝將自身世界觀、倫理觀、政治關係等投射在上的文本，而在明清時期，這類文本，就是所謂的《會典》。雖然明清兩代，都使用《會典》這一體例，但在內容上有明顯差異。因為明朝受限於自身對外政策，在面對內陸亞洲的政團關係時，無法達到長期穩定，例如《大明會典》中，曾受過明朝冊封的西方或北方政團首領及其部落的文字解釋中，經常出現「朝貢無常」、「共無常期」等字樣。¹⁵⁸ 不過這種天下政體的情勢，到了清朝則有所轉變。在清朝的對外事務，分別由兩個中央機構管理，一個是繼承明朝舊制的禮部，管理鄰近行省周邊地區與海上貿易而來的朝貢國；另一個則是從蒙古衙門發展完善的理藩院，作為清朝進行國家建構的重要工具，在管理藩部事務，及與藩部在地域上接壤的政團等，使得清王朝能夠積極介入內亞事務，讓該

¹⁵⁷（清）清高宗御製，《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再定準噶爾第三，〈左部哈薩克瓦里蘇爾坦遣其弟哈斯木入覲於山莊萬樹園錫宴因成是什〉，頁 17a-17b。

¹⁵⁸ 曹雯，《清朝對外關係研究》，頁 22-24。

地人群不再被視為蠻夷外國之人。

清王朝總共編纂五次《大清會典》，最初的會典成書於康熙 29 年（1690），而最後一本成書於光緒 25 年（1900）。而清中國與周邊諸多政體的互動關係大致奠定於乾隆年間，比如西北方向的內亞政團，或是沿中南半島地區的政團等等，但須注意的是乾隆年間編纂的《欽定大清會典》是在乾隆 29 年（1764）成書，較難反映整個乾隆朝禮儀的變化與對外關係的調整。因此，接下來所使用的政書材料，以嘉慶 23 年（1818）成書，收錄到嘉慶 17 年的《欽定大清會典》為主。

不過，在以貫時性的角度分析《會典》條目前，筆者在本節所採的視角並非將《會典》視為單純的事實紀錄或是資訊，而是以司徒安在《身體與筆》一書的視角來理解，即從人類學的視角探討這些文本的「呈現」、「彰顯」，代表著將行為規範置於時間的脈絡中，並且作為萬物準則《大清通禮》間互為表裡。同時，《會典》當中許多關於動作與視覺活動的條目本身，即象徵著禮儀行為本身兼具極強視覺性。

對於清帝而言，禮儀本身是一種和諧秩序宇宙觀的體現；同時，也統治者心中展現理想權威的方式，所以皇帝們常精心於刻畫身體動作所經過的特定空間，以及常規化的身體姿勢與動作，並以此達成在君王與臣民、主人與賓客之間，以間接且象徵的方式，展現尊卑階序的政治關係。而朝覲禮儀本身作為一種中心型政治，在面對外賓時的一種禮儀展演。因為在權力從中心向外擴散的同時，作為外賓的使節則是由外向化於中心。不過，在此需指出筆者在本文中缺少展開清朝承德避暑山莊與北京的朝覲儀式時的差異，或可成為分析朝覲禮儀的取向。¹⁵⁹

而如何在覲見禮儀時，展現主客、客客之間的親疏遠近，則是需要從排序的班位談起，雖然大多《會典》材料在描述班位時，多以按表羅列的方式呈現。不過，若從一些外國使節對於自己的班位，被清朝禮部安排錯誤的反對聲來看，即側面證實班位的重要性。像是道光 21 年（1841），在次序上大南應該在該年覲見的各使節如琉球、暹羅、南掌之前，但在該年卻被安排在後位，引起大南國王的不滿，甚至向清朝禮部提出異議。¹⁶⁰ 這點從側面可見班位對於朝覲者的意義。

清朝通常使用使臣行覲見禮的空間排序，來展現對於使臣背後政團的重視。從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則例》當中的〈班位〉，乾隆朝哈薩克的班位改變，反映清朝方面對於哈薩克入覲者的要求。一般而言，中亞諸政團的首領或使臣，被安排在與蒙古王公、回部伯克或琉球國使臣等等一同覲見皇帝。而在乾隆 38 年（1773）至 55 年（1790），作為正使朝覲的哈薩克汗王之子弟，在蒙古公，或貝

¹⁵⁹ 感謝長谷川老師在論文口試環節中提出筆者的不足。從巡幸討論承德與北京朝覲差異，筆者日後會參閱張勉治 (Michael G. Chang) 的《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 1680-1785》。

¹⁶⁰ 何新華，《威儀天下：清代外交禮儀及其變革》，頁 57。

子之次、回部王公之前行禮，副使則在三品或六品官之末行禮，即與同時期的中亞各部朝覲使臣行禮班位明顯不同。比如較為明顯的是，乾隆五十七年浩罕使臣來京時，僅排在京回子之末行禮。¹⁶¹ 總之，如同大南國的案例，覲見禮的班位順序，展現在清朝朝覲儀式中各政團與清朝的親疏關係，¹⁶² 並關於班位的討論，成為禮儀會典中記錄權力關係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身為外藩代表的哈薩克使臣在排序上，位於身為藩部的蒙古之後，以及同為藩部的回部伯克之前。如果借用曼考爾（Mark Mancall）與坂野政高的觀點，¹⁶³ 將清朝周圍地區劃分為西北新月帶與東南新月帶，並且依照理藩院／禮部；非儒家／儒家文化來區分。然而，哈薩克與蒙古、回部皆同處於西北新月帶，並且在文化上與回部相同，也皆信仰伊斯蘭教。而與綠洲城市政權中回部首領的不同之處，在於哈薩克諸部屬於游牧政權。如果將之類比前文提及大南國以漢文使用理應排在前面的邏輯來看，清朝方面在西北新月帶，筆者認為清朝除了是以歸附時間安排先後次序之外，應該是依照該政團的生計方式，作為親近遠疏的依據，這點也體現在《大清會典》書寫格套中，如「哈薩克左、右部；布魯特東、西部」等游牧部落政權，相較前於「安集延、瑪爾噶朗、霍罕、那木干、塔什罕、拔達克山、博羅爾、愛烏罕」等等內陸亞洲政團之前。¹⁶⁴

¹⁶¹ (清) 托津等奉敕纂修，《大清會典事例》(清嘉慶年間刻本)，卷二百三十六，禮部四，朝會二，〈班位〉，頁 11a-13a。

¹⁶² 英卡爾·巴合朱力，〈乾隆朝接待中亞各部朝覲使團之禮儀及其效用〉，頁 54。

¹⁶³ [美]曼考爾 (Mark Mancall)，〈清代朝貢制度新解〉，《中國的世界秩序》，頁 65-80；[日]坂野正高，〈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ヴァスコ・ダ・ガマから五四運動まで〉(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頁 77。

¹⁶⁴ (清) 蔣溥、孫嘉淦等撰《大清會典》(乾隆朝)，卷八十，〈徠遠清吏司〉，頁 14a-14b。

五、結論：以朝覲制度再思天下

若將「天下國家」視為一種政體，又該如何理解作為諸政團之間的互動關係的朝覲禮儀。筆者認為能從清朝統治者在「參漢酌金」的背景之下，運用禮儀規範化完善國家建構，並讓禮儀行為與權力關係之間相互連結的同時，由於滿、漢文翻譯實踐中所衍生的概念浮動之中找尋答案。同時，隨著清王朝的版圖因乾隆年間征服準噶爾而擴大，與之相伴而來是新的對外關係的建立，新接觸的內陸亞洲政團，能否接納清朝禮儀背後天下政體概念，在雙方商討過程中又將會出現哪些問題，則是本文想以滿文檔案試著從滿文朝覲概念實踐的角度談論的問題。

首先，筆者以清王朝「詞與物」的世界回答這個問題。藉由分析《康熙字典》與康熙、乾隆兩朝的民間與官方滿文辭書中關於朝覲禮儀的用語釋義，可以在此先對於朝覲禮儀的原理做出定義：天下政體之中的政團首領，在空間上前往京城中的「朝」(hargāšan)，並且親自向皇帝施以叩頭(hengkilembi)禮。不過，在此需指出漢文朝覲中偏向「看見」的意涵，康熙年間的滿文語境中則較保留臣屬者叩頭的肢體動作。直到乾隆年間，原先用來描述朝覲的用語，逐漸在乾隆的新清語運動下，被「朝」(hargāšan)系列的用語所取代。而這些政治與禮儀概念在歷史中的動態挪移，反映清朝在沿用明代政治制度時，並非單純的繼承前朝制度，而是在「參漢酌金」的原則，並根據當下的政權統治需要，對於古代禮儀再詮釋。

而在概念實踐上，筆者選用哈薩克諸部做為「天下」政團的案例，並且從滿文檔案、《實錄》、《方略》等材料回顧哈薩克諸部，如何從進入清朝皇帝的視野中，並逐漸與清朝建立聯繫，藉此整理出使節朝覲皇帝的時間順序，並且透過史書、御製詩等材料，分析朝覲皇帝對於清朝與哈薩克之間的意義，而從雙方互動來往的文書來看，清朝方面修辭與史書編纂來看，清朝是有意識地將哈薩克諸部納入自身的天下秩序中；同時，筆者也透過滿文檔案，重新探討哈薩克諸部遣使入覲的規範來源，與後來記載與學者的分析相互吻合，並且藉由檔案的用語回應本研究想要處理的滿文朝覲概念，比如「朝」(hargāšan)是如何使用在乾隆朝的滿文書寫。

若從經典詮釋綜觀本文的研究，朝覲禮儀本身的意涵是不斷為當下的歷史行動者所用，但其最基本的元素，即主奴或主客關係透過視覺意義上的親自會面。而朝覲作為中國與域外雙邊政治關係的體現，則是一直存在於彼此的政治實踐中。不論是乾隆帝跟後來反叛阿睦爾撒納之間要求入覲未果，還是平準戰爭帶來日後哈薩克諸部相繼入覲時，使得清王朝與內陸亞洲政權建立主僕關係等等，則代表朝覲禮儀作為一種共享的禮儀符號，歷史行動者自身是有遵守與拒絕的可能。同

時，正是因為清朝統治者能夠將內亞政治傳統融入「中國」的制度中，所以隨著二元中國進一步將天下制度擴大，才能有辦法在附屬於天下體制之中的朝覲禮儀中，能夠用以吸納來自內陸亞洲的政團。從而形成模仿周代諸侯王朝覲天子的天下中國體制，並且最終在各種紀念性與視覺性材料中，折射出乾隆帝心目中萬國來朝的政治圖像。

然而，哈薩克等內亞政團能夠接受朝覲禮儀的實踐，及其背後表達彼此之間親疏遠近的意涵，但朝覲的語境，卻難以被 18 世紀末葉主要以商品販售為導向的英國接受。因此，馬戛爾尼使團的來華時，貢使覲見禮過程中的三跪九叩禮卻成為雙方之間的禮儀爭議之一。¹⁶⁵ 當然，筆者無意以後人立場批評清王朝的禮儀制度，而是想藉此指出清王朝本身對外的認識模式。在筆者研究哈薩克的過程中，意識到清朝在近代轉型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問題，比如清朝在面對中亞政團時，幾乎是傾盡舉國之力探究相關的情報；然而在清朝認知中地緣政治影響較小的歐洲國家，則成為其未必考量進自身對外關係中，需要籠絡的對象。

因此，清朝沿襲自歷史中國對外關係的觀念與禮儀實踐的原理，使其即使在空間、族群等範圍上因為各種機遇得以持續擴大，甚至深入傳統中國王朝難以深入的中亞核心地帶等，卻仍難以突破舊有的世界觀，並且整合來自邊境四面的資訊，提出一套有效的對外方針，以上種種因素，導致清朝在近代轉型過程中，面對來自邊疆的威脅從而相對失勢。¹⁶⁶

此外，關於本文未能繼續深入的禮儀視覺化的問題，筆者在此想提出幾點有待後人處理的部分。在賴毓芝指出《萬國來朝圖》這類反映朝覲禮儀的宮廷繪畫，藉由西洋繪畫中的透視法，將乾隆帝心中的帝都營造與天下關係的理想樣貌，呈顯在圖繪中。¹⁶⁷ 而類將禮儀透過圖繪的方式視覺化，或能夠跟司徒安探討禮典文本本身兼具視覺性相互對話，並且結合筆者在第三章探討的滿語概念演變，比方說朝、班位、朝覲、朝集等詞彙意涵的視覺化呈現，進而探討這些概念與新清語的定義能否相互配合等等。與此同時，關於清代巡幸制度，亦即清帝時常往返於北京紫禁城與承德避暑山莊兩地，是否會影響朝貢與朝覲制度的運作，則更有待筆者下一階段的探究。

（特此感謝王婷儀、張冉協助校勘）

¹⁶⁵ 何偉亞，《懷柔遠人》，頁 196-199。

¹⁶⁶ [美]馬世嘉（Matthew W. Mosca）著，羅盛吉譯，《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臺北：臺灣商務，2019）。

¹⁶⁷ 筆者認為賴毓芝，〈構築理想帝國：《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的製作〉、〈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等文章，可藉由滿文關鍵字的角度，重新考察圖畫中呈現的人物走位與使團成群結隊的意義。筆者注意到 yamulara isara hacin（朝集類）詞彙中，有些詞彙的描述與圖示之間相互吻合。

附錄



附錄一、〈參贊大臣富德奏聞與阿布賚商定輪班覲見情形摺〉翻譯¹⁶⁸

wesimburengge

奏

aha fude gingguleme

奴才 富德 謹

wesimburengge

奏

donjibume wesimbure jalin juwan biyai juwan emu de

聞 奏 為 十月 十一日

sasa alime gaiha erkšara, nusan sei baci alibume

俱 領受 額爾克沙喇、努三等 呈送

benjihe bithede, uyun biyai orin nadan de alime

咨文 九月 二十七日 領受

gaiha jiyanggiyun hebei amban i afabume unggihe

將軍 參贊大臣 的劄付

wesimbuhe bithei dorgide nusan sade jasifi damu hasak

奏書 於內 努三等 寄送 只 哈薩克等

sede suwe

於 爾等

amba ejen i elhe be baime, beye geneki serengge bici,

大皇帝（主子） 請安 親自欲前去者 若有

beye gene. beyei funde juse deote be unggiki elcin takūraki serengge.

親自使去 親自 代替 子弟 把 請遣去使臣 差遣 著也

bici elcin takūra meni jiyanggiyun ambasa

若有使臣派遣 我們的將軍 大臣

¹⁶⁸《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26，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富德奏聞哈薩克阿布賚商討年班覲見摺〉，頁 244-246。筆者將本奏摺翻譯採用逐字對譯的方式，人名部分則採用實錄、方略等當時的漢文翻譯，而分行的部份是依照史料檔案原樣呈現，以方便其他學者能參考使用。



amba ejen de donjibure wesimbufi suwembe dosimbufi
 大皇帝（主子）聞奏 把你們聽聞
 ejen i kesi be alimbi seme.
 把皇帝的恩 領受 等語
 hesei tacibuha songkoi gisurekini sehebi. baicaci abuli genere
 救命 請依議 欽此 查 阿布賚去向
 onggolo abulai meni baru hebešeme icihiyahangge te meni
 先前與 阿布賚我們同 商議辦理 今我們的
 gebu be gemu
 名聲 把 全部

amba ejen de wesimbuhe mini gūnin de. meni elcin
 大皇帝（主子）奏了 我們的意圖 我們的使臣
 henjigar se isinjiha manggi . mini beye bahafi generakū
 肯亨集噶爾等 送到後 我們親身 未去
 bicibe .jui be unggici acambihe. jui umesi
 雖然 子 把 派遣 會見了 子 非常
 ajige geneci ojarahū. jai mini deote solton se dalaha
 小 若前去 不可 又我的 子弟 蘇勒統等 統領
 baturu se dorgi adarame.
 巴圖魯等在內如何

ejen i genggiyen be hargašame geneci tusa. ambasai baru
 主子的英明 把 朝覲 去 之利益 大臣等 向
 hebašeme icihiyaki sehede meni gisurehengge , abulai si
 商議 辦理 已說於 我們言著了 阿布賚 你
 amba ejen de dahafi giyani beye hargašame geneci
 大皇帝（主子）歸附道理 親自朝覲 若前去
 umesi sain bihe. jui geli ajlge geneci ojarahū be
 甚 好 也 子 又 年幼 前來 不能 將
 dahame sini deote i dorgide unggiki ombi. juwan
 順著 你的子弟之內 派遣著（變成）十
 udu solton dalaha dehi duin bature sei dorgide
 幾個 蘇勒統 統領四十四位巴圖魯等 之內
 aici ilan duin idu banjibufi beye eshun sede
 怎樣的三、四班 編派 身 生 等



oho geneci ojarahū urse oci. deote juse be
行了 若不能前去 則同輩矣 弟子 把
unggire. deote juse akū urse oci. elcin takūrara
遣去著 弟 子 沒有 則可以同輩 使節差遣也

oci geme ombi , uttu oci siran i gemu bahafi
皆變成。若是這樣 則接連 全部 獲得
ejen i senggiyeng be hargašaci ombime
主子的英明 把 去朝覲 可也
ejen i ujen kesi be alimbi se geneci bar kun ci casi
把主子的重恩 領受等 歲 前去 巴里坤 從 往那邊
gemu giyamulame yabume beleni morin be yalumbi. beileni
皆馳驛著 現成的馬 把 騎走。現成的
jaka be jembi.
貨 把 吃掉

ejen be hargašame manggi. suwe de jaka šangnaha manggi
主子 把 朝覲 以後，你們 物品 賞賜以後。
jaka hacin jugūn i unduri niyalma tuwašame
物品項目 道路途中 使 人 照看著
suweni beye sasa benjibume amba coohai kūwaran de
你們親自一同 送來 大 軍 營 在
isibumbi amba coohai kūwaran ci suweni werihe kutule
使到達 大 軍 營 向你們 留下 牽馬人
ulha de acafi jidere oci , suwende teni tusa
牲口 匯聚到來，於你們剛剛獲利益
giyamulame generede fulu kutule baiburakū seme kisurehede
驛馳於 多餘的牽馬人 不需要等情，依議。

abulai umesi urgunjeme uttu oci ambasa emgi
阿布賚非常喜悅如此， 臣等共
ejen be hargašame genere urgen i ton be hebešeme
把主子 來朝覲 前去，把尺寸數額 共議
toktobuki . damu meni hasak sol son¹⁶⁹ i nuktehebi. emu
決定。只 我們哈薩克 蘇勒順 的 游牧
obume gisurere de mangga. te esede ulhiburakū gebu be
是一個 說 難， 今這些人 不告訴 名諱 把

¹⁶⁹ 筆者按：應作 *sol ton*，亦即蘇爾統、蘇勒統，為蘇丹之音變。



arafi baci. nergin de isinha manggi jurcenjere hacin bi.
寫下來如果，到了時候， 違背 項目有
uttu be dahame, mini gūnin de jugūn goro
因此 我們心意 路遠

komso niyalma yabure de mangga. solton i dorgi . mini
很少 人 行到 難 蘇爾統之內 我的
deote juwe niyalma be dalabufi batura se dehi
我的子弟、二人等 把 統領 巴圖魯等 四十
duin niyalma be juwe idu obufi emu idu de
四人 把 兩 年班變成一年班
juwe sol ton, orin juwe dalaha bature be
兩位蘇勒統 二十二人 統領巴圖魯
ejen be hargašame unggiki, amba cooha kūmara ci
主子把 進去來朝覲 大 軍營 向
casi giyamulame yabure de solton de kutule juwete,
往那邊 馳驛著 於 蘇爾統 牽馬人各二人

dalaha batura sede kutule, emte uheri kutule be
把 統領巴圖魯 人等牽馬人 各一 總牽馬人
dabume susai niyalma be meni elcisa henjigar isinjiaha
算入 五十 人 把我們 使臣等亨集噶爾前來了
manggai.
至多。

ejen i genggeyen be hargašame unggiki. uluyus kesiyus han¹⁷⁰
主子的英明 把來朝覲 請發遣，大（烏拉）玉茲、小（奇齊克）玉茲汗王
solton elcin unggihe eride. inu, esei sasa unggiki
蘇爾統、使臣遣來於此。亦這些人一同 請發遣
seme. abulai emgi gisureme toktobufi niyalma ton
等情。阿布賚共同 議訂 定例 人 數額

kutule ton be ambulai tot hergen arafi gamaha.
牽馬人數目把甚多的托忒文字 寫下領去
uttu be dahame , encu icihiyara be baiburakū gese
把如此遵從 把另樣辦理 不需要 相似

¹⁷⁰ 此為避諱 han 的避諱，即 ñ 表示原文的 n 旁多加一點。同時，在此提出否此避諱詞理論上不會出現在奏摺頂端，以免冒犯皇帝。

bicibe, hasak banin be tuwaci tokto buha baita be
雖然 哈薩克容貌 把 若看著 訂定 事務 把
urunakū acabume yabumbi seci ojarahū ofi. jiyanggiyūn
必定 配對著 行事 若是 不可 將軍
hebei amban i afabuha songkoi
參贊大臣 的交付 照樣。



ejen be hargašame geren, ujen kesi isibumbi sehede
主子把 朝覲 眾多 重 恩 來到 欽此

dolotbai baturu geren hasak se baru gisurehede
多羅特拜 巴圖魯眾 哈薩克等向 說著
gemu urgunjembi seme alibume benjihebi, erei jalin
皆 喜悅 等語 稟報 此 為
gingguleme
謹

donjibume wesimbuhe
聞 奏

abkai wehiyehe i orin juweci aniya omšon biyai
乾隆 二十二年 十一月
orin nadan de
二十七日
fulegiyan fi pilehe
硃批

hese saha sehe,
旨 知道了

juwan biyai juwan ninggun
十 月 十六日


附錄二、乾隆年間哈薩克諸王公遣使入覲表（1757年至1795年）

本表根據厲聲，《哈薩克斯坦及其與中國新疆的關係：15世紀~20世紀中期》，頁127-129；郭文忠，《乾隆時期與哈薩克諸部關係研究》，頁231，所使用從現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內務府掌儀司檔案》，其中及收錄〈呈為哈薩克來京次數筵宴清單〉，大致紀錄乾隆朝以來哈薩克在京城活動赴宴的情況等基礎上，添加收入《清高宗實錄》中皇帝對於哈薩克使臣的反應。

* 在此右部哈薩克，以粗體表示；左部哈薩克，以標楷體表示；西部哈薩克，以斜體標示。

表三、乾隆年間哈薩克諸王公遣使入覲表（1757年至1795年）*

次數	年代	遣使王公	入覲使節	事件	清高宗實錄
1	22年(1757) 九月	阿布賚 阿德勒比斯	亨集噶爾、烏 穆爾泰、都楞、 阿蘭扎等4人 塔納錫、伯克 奈等2人	齋表入覲行禮，賜 使臣等，及扈從王 大臣等宴。	卷546，頁961。
2	23年(1758) 十月	阿比里斯、 汗巴巴	卓蘭、博索爾 璜	於行宮朝覲 朕加恩筵宴，復隨 駕入都，重申宴 賚。	卷575，頁311。
3	25年(1760) 五月	阿布賚、 阿德勒巴木 比特、 阿德勒比斯	瑚圖拜、阿塔 賚等。	上幸同樂園。又賜 來使等頂。翎。 冠。服。朝珠。 銀。緞。器物等 物。 各有護送來京朕召 見奏對後加恩宴賚。	卷613，頁895。
4	十月	阿布賚	其弟 都勒特 克呼、伯克奈	命隨圍與觀	卷621，頁982。
5	26年(1761) 正月	阿布賚	蘇勒統卓勒巴 喇斯等11人	並令與宴	卷628，頁1。
6	27年(1762) 二月	阿德勒巴木 比特、阿布 勒比斯、沙 呢雅斯蘇勒	策伯克等	各賜敕書	卷655，頁329。

		統罕和卓、 博羅特蘇勒 統			
7	五月	阿布賚	阿塔海	清朝官方發現使臣 阿塔海竄改表章內 容。	卷 660，頁 389。
8	七月	阿布賚	都勒特克呼蘇 勒統等	隨駕木蘭觀圍，加 恩賞賚	卷 666，頁 452。
9	28 年(1763) 正月	烏爾根齊部 哈札布、奇 齊玉斯奴爾 里	烏克巴什頗拉 特、塞德克勒	賜敕書	卷 678，頁 586。
10	29 年(1764) 正月	阿布勒比斯	策伯克等 7 人	跪迎聖駕於午門 外。上溫語慰勞， 賜冠服銀幣有差。	卷 701，頁 841。
11	三月	阿布勒巴木 比特	亨集噶爾等 12 人	跪迎聖駕於午門外， 上溫語慰勞，賜冠服 銀幣有差。	卷 706，頁 891。
12	30 年(1764) 四月	阿布賚	鄂托爾齊 等	上御勤政殿召見， 隨幸同樂園賜食。	卷 735，頁 94。
13	32 年(1767) 八月	阿布賚	都勒特克呼等 7 人	上於和門宣見，賜囊 韃裘服，并令隨圍從 觀。	卷 793，頁 720。
	33 年(1768) 九月	筆者認為厲聲在書中記下這次朝覲，應該是隔年四月份的阿布賚的使臣覲見，因此不計算本次。			
14	十二月	阿布勒比斯	卓勒齊等	因其子卓勒齊年齒 尚幼，遠來瞻覲， 故乾隆帝要求圖中 的地方要員務加意 照料，才能顯示皇 帝體卹外藩之意。	卷 825，頁 1203。
15	34 年(1769) 三月	阿布賚	幹里蘇勒統、 陪臣雅拉爾噶 布比等 15 人	賜茶，並各賜冠服 有差、銀幣有差。	卷 831，頁 82。
16	38 年(1773) 一月	阿布勒比 斯、博羅特 汗、台吉薩 尼雅斯、阿	卓勒齊、咱哈 木、阿克太里 克、其子阿底 勒蘇勒坦等	賜宴。	卷 924，頁 424。

		布賚	15 人		
17	十二月	阿布賚	其子阿底勒蘇勒坦等 15 人。		卷 949，頁 861。
18	41 年(1776)十二月	阿布賚	鄂托爾齊等 8 人	各賜冠服有差。	卷 1023，頁 709。
19	45 年(1780)五月	阿布賚	色德克素勒坦等 8 人。	迎駕瞻觀，各賜冠服有差。	卷 1106，頁 798。
20	47 年(1782)五月	幹里素勒坦	其弟沙海素勒坦等 9 人	於出入賢良門外瞻觀，賜冠服銀幣有差。	卷 1155，頁 472。
21	48 年(1783)四月	阿布賴素勒坦 阿德勒比斯	哈喇托霍 其子噶岱等 10 人	賜冠服銀幣有差。	卷 1178，頁 793。
22	51 年(1786)十二月	汗和卓	其弟阿哈岱等	上幸瀛臺	卷 1271，頁 1136。
23	52 年(1787)八月	幹里蘇勒坦	其弟哈咱木、副使達雅爾等 5 人	上御卷阿勝境……賜食	卷 1286，頁 244。
24	55 年(1790)七月	杭和卓	其弟卓勒齊等五人入觀	上御卷阿勝境召見……餘各賞賚有差。	卷 1358，頁 202。
25	十二月	幹里素勒坦	其弟多索里素勒坦、陪臣使愛濟拜等五人	於西苑門外瞻觀	卷 1369，頁 367。
26	56 年(1791)七月	幹里素勒坦	其子 阿彌載使等 4 人。	上御卷阿勝境、賜食	卷 1383，頁 567。

參考文獻



文獻史料

- 《禮記》，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91。
- (元) 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 (宋) 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 (清) 托津等奉敕纂修，《大清會典事例》(清嘉慶年間刻本)。
- (清) 松筠編纂，《欽定新疆識略》(收入《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彙編》，冊 19，北京：學苑出版，2006，上海積山書局石印本)。
- (清) 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 紀昀、傅恆等敕撰，《御制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32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 桑額，《滿漢同文分類全書》(版本取自法國國家圖書館 (BnF))
- (清) 桑額，《滿漢類書》(版本取自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
- (清) 馬齊、馬爾漢等撰，《御製清文鑑》，收入《曉星女子大學阿爾泰語資料集第三輯》，大邱：曉星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82。
- (清) 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 (清) 清高宗御製，《御製詩文十全集》(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
- (清) 傅恆等撰，《平定準噶爾方略》(乾隆 31 年 (1766) 殿本)
- (清) 溫達等奉敕撰，《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54-35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 劉順、桑格，《同文彙集》(版本取自法國國家圖書館 BnF)
- (清) 劉順、桑格，《同文廣彙全書》(版本取自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
- (清) 章甫、賽尚阿等編纂，《欽定回疆則例》(清道光 17 年 (1837) 刊本)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哈薩克斯坦東方研究所編輯，《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彙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著，《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故宮博物館編，《一學三貫清文鑑》，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723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根據靜宜齋藏版。

故宮博物館編，《欽定清語》，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723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根據清代阿恩哈佛德家刻本。

故宮博物館編，《同文之盛：清宮藏民族語文辭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日] 田村實造、今西春秋、佐藤常共譯，《五體清文鑑譯解（上卷）》，京都市：京都大學文學部內陸アジア研究所，1966。

近人研究

專書

尤淑君，《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臺北：聯經，2014。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2。

何新華，《威儀天下：清代外交禮儀及其變革》，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

何新華，《清代朝貢文書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

何新華，《最後的天朝：清代朝貢制度研究》，廣州市：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

何新華，《清代貢物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佟永功，《滿語文語滿文檔案研究》，瀋陽：遼寧出版社，2009。

吳麗娛主編，《禮與中國古代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宋瞳，《清初理藩院研究--以順治朝理藩院滿文題本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李治國，《清代藩部賓禮研究——以蒙古為中心》，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2014。

杜正勝，《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臺北：一卷文化，2023。

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桃園：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4。

馬子木，《經略西北：巴達克山與乾隆中期的中亞外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高明士，《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變遷為中心》，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

張雙智，《清代朝覲制度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曹雯，《清朝對外體制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莊吉發，《滿漢異域錄校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4。

郭文忠，《乾隆時期與哈薩克諸部關係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陳戍國，《中國禮制史：元明清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黃俊傑主編，《理想與現實》，臺北：聯經，1982。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二版)》，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

趙雲田，《清代理藩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劉鳳雲，《清代的國家認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厲聲，《哈薩克斯坦及其與中國新疆的關係：15世紀~20世紀中期》，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4。

鍾焯，《清朝史的基本特徵再探究：以對北美「新清史」觀點的反思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20。

羅艷，《大清皇室的祭典禮：禮儀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

[日]岩井茂樹，廖怡錚譯，《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臺北：八旗文化，2022。

[日]宮脇淳子，曉克譯，《最後的遊牧帝國：準噶爾部的興亡》，呼和浩特：內蒙



- 古人民出版社，2005。
- [日]濱下武志，李侑儒、許佩賢、郭婷玉等譯，《海的亞細亞：濱下武志跳脫陸地中心的史學視野，海洋如何奠定亞洲的貿易、移民、世界觀和國際秩序》，臺北：大家出版，2023。
- [法]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王國卿、毛鳳支等譯，《停滯的帝國：一次高傲的相遇，兩百年世界霸權的消長》，臺北：野人文化，2018。
- [哈]克拉拉·哈菲佐娃，《十四——十九世紀中國在中央亞細亞的外交》，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 [美]濮德培（Peter C. Perdue），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臺北：衛城出版，2021。
- [美]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怡溢、吳家恆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臺北：時報出版，2015。
- [美]司徒安（Angela Zito），《身體與筆：18世紀中國作為文本／表演的大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 [美]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著，賈建飛譯，《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 [美]何偉亞（James L. Hevia），鄧常春譯，《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 [美]馬世嘉（Matthew W. Mosca），羅盛吉譯，《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臺北：臺灣商務，2019。
- [美]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主編，杜繼東譯，《中國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美]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編，《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 [美]歐立德（Mark C. Elliott），青石譯，《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臺北：八旗出版，2017。
- [美]羅友枝（Evelyn S. Rawski）著，周衛平譯，《最後的皇族：清代宮廷社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 [韓]金文京，《漢文與東亞世界：從東亞視角重新認識漢字文化圈》，臺北：衛城

遣使入觀：清代朝覲制度研究再析

出版，2022。

[日]小沼孝博，《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東京：日本出版販売株式会社，2014。

[日]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

[日]坂野正高，《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ヴァスコ・ダ・ガマから五四運動まで》，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

Keliher, Macabe (克禮), *The Board of Rites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Noda, Jin(ed.), Takahiro, Onuma(ed.).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Tokyo: Department of Islamic Area Studies, Center for Evolving Humanities,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2010.

Wills, John E. Jr.,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84.

論文

孔令偉，“Information Circulation of Eurasian Knowledge between Kalmykia, Tibet, and the Qing Empire”，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12 年度第十三次學術講論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23 年 9 月 18 日。（會議論文）

孔令偉，〈依違於清俄帝國之間：歐亞史視野下的阿睦爾撒納與準噶爾汗國〉，收入陳正國主編，《1723，世界史的 11 扇窗：接觸、匯聚與開創，從全球史中的人物，看見現代世界的格局與變化》（臺北：聯經出版社，2023），頁 64-87。

尤淑君，〈從汗國到帝國：金至清初賓禮制度的更定〉，《故宮學術季刊》，32 卷，2 期（2014，臺北），頁 81-115。

尤淑君，〈清代覲禮之爭與賓禮變革〉，《中華禮制變遷史》（北京：中華書局，2022），頁 340-399。

甘懷真，〈中國古代君臣間的敬禮及其經典詮釋〉，《臺大歷史學報》，31 期（2003，臺北），頁 45-75。

甘懷真，〈天下概念成立的再探索〉，《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9 期（2010，北京），頁 333-349。

- 甘懷真，〈重新思考東亞王權與世界觀——以「天下」與「中國」為關鍵字〉，《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頁 1-51。
- 甘懷真，〈秦漢的「天下」政體：以郊祀禮改革為中心〉，《新史學》，16 期（2005，臺北），頁 22。
- 甘懷真，〈從天下到地上：天下學說與東亞國際關係的檢討〉，《臺大東亞文化研究》，5 期（2018，臺北），頁 289-317。
- 吳恩榮，〈清朝禮制的起源：努爾哈赤時期的等級性汗國禮俗〉，《肇慶學院學報》，42 卷，6 期（2021，肇慶），頁 12-18。
- 吳阿木古冷，〈1755-1758 年間阿睦爾撒納與哈薩克阿布賚汗關係考〉，《西蒙古論壇》，4 期（2014，烏魯木齊），頁 7-15。
- 李孟衡，〈從朝鮮、滿洲間的逃人刷還問題看十七世紀東北亞國際秩序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5。
- 杜正勝，〈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古今論衡》，39 期（2022，臺北），頁 1-58。
- 周軒，〈從乾隆帝西域詩看新疆與中亞之關係〉，《西域研究》，2 期（2012，烏魯木齊），頁 30-37。
- 林士鉉，〈契約文書中的滿漢合璧印章：以《宜蘭古文書》為例〉，《政大史粹》，4 期（2002，臺北），頁 1-20。
- 林士鉉，〈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4 卷 2 期（2006，臺北），頁 58-108。
- 洪濤，〈評乾隆皇帝的哈薩克政策〉，《西域研究》3 期（2000，烏魯木齊），頁 24-30。
- 英卡爾·巴合朱力，〈乾隆朝接待中亞各部朝覲使團之禮儀及其效用〉，《清史研究》，5 期（2023，北京），頁 49-62。
- 孫啟仁，〈清初滿族跪拜禮簡述〉，收入《第三屆國際滿學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頁 207-218。
- 張啟雄，〈「中華世界帝國」與琉球王國的地位——中西國際秩序原理的衝突〉，《第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1991），頁 419-474。
- 陳尚勝，〈試論清朝前期封貢體系的基本特徵〉，《清史研究》，2 期，（2010，北

京)，頁 86-94。

葉高樹，〈人群與地域：乾隆皇帝對「西域」的認識〉，《歷史教育》，23 期（2021，臺北），頁 53-112。

蔡偉傑，〈多元視角下的朝貢體系與中外關係史研究〉，《全球史評論》，第 23 輯（2022，北京），頁 275-284。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 期（2012，臺北），頁 1-76。

賴毓芝，〈構築理想帝國：《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的製作〉，《紫禁城》，總 237 期（2014，北京），頁 56-69。

[美]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尚揚譯，〈後現代式研究：望文生義，方為妥善〉，《二十一世紀》，44 期（1997，香港），頁 105-117。

[日]小沼孝博〈ヌサン使節の派遣—1757 年における清とアプライの直接交渉〉，《アジア文化史研究第 14 号》（宮城：東北学院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14），頁 1-20。

Chia, Ning. "The Lifanyua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Ph.D. dissert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1.

Chia, Ning. "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 (1644-1795)," *Late Imperial China*, Volume 14, (1993), pp. 60-92.

Di Cosmo, Nicola.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Inner 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2, (1998), pp. 287-309.

Söderblom Saarela, Mårten. "A Dictionary of the Imperial Capital: Shen Qi liang's Da Qing quan shu (1683)," Editor: Glenn W. Most, Dagmar Schäfer, and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Plurilingualism in Traditional Eurasian Scholarship: Thinking in Many Tongues*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23), pp. 274-283.

線上資料庫

康熙字典線上版，<https://www.kangxizidian.com/index.php>（2023 年 12 月 15 日檢索）。

〈滿洲語辭典 Manchu Dictionaries〉，粟林均 言語資料檢索システム，<http://hkuri.cneas.tohoku.ac.jp/p06/kdic/list?groupId=18>（2023 年 10 月 15 日檢索）。

跋



很高興你能夠看到這邊，我其實有時會在想一本書，還是需要使用中國傳統書籍文類的序跋文體。所以我在開頭處使用了敘傳這個班固在《漢書》中講述自己的文體，用來回顧我在師大與臺大這段求學時光的所見所聞，以及這一路上認識的老師朋友們。或許對於那些酷嗜研究人際網路的學者而言，這篇敘傳可以說是寶藏滿滿，因為它涉及一位志於研究清史的學生，如何接觸這門領域中的各個學術先進，並且如何與他們互動等等。

不過，回到跋的文體的功用，是作為介紹本篇文章的學術意義與該如何閱讀。我還是在此指出兩點，以作為未來打開這本或許已塵封已久的論文的任何人，這篇文章可以給你帶來怎麼樣的幫助。

首先是詞彙概念史的追尋，其實並非只是翻閱字典、辭書如表面上的來得枯燥，因為當你在閱讀清朝初年的字典時，你將會進入到一個古人如何認識萬物的詞彙世界，尤其是你如果專精在清前期的話，每每看到清人翻弄字音、字義將滿漢兩門語言，串聯成他們所謂同文概念時所做的努力；其次是關於這本學士論文，明確指出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仍是一座研究清史的寶庫，值得後來的學者們繼續開發，或許就在轉角處，喔～不對！翻頁處便能發現一片新天地。

最後，再回到我自己的關懷吧！畢竟我是那種期許我日後做學問的態度，能夠跟伯希和一樣，能夠因「ca m'amuse，即那讓我覺得好玩！」，就去求做學問的人，所以希望未來的自己繼續保持初心！

○朝，早也；陪，朝也。書寫至此，木龍已在黃金雨與獅豹雨之中，行遊過半。

感謝一路上良師益友的幫助，使得拙文有幸榮獲本年度的臺大學士論文傅斯年獎，這也是這段文字能夠出現在你的面前的原因。但些許疏失使我仍需夙夜匪懈、枕戈待旦。

○聘，問也。短暫的失意總是令人銘記何為亢龍有悔。而家母美珍、雨桐、婷儀、張冉、詩琪，妳們一聲聲捲土重來之路順利、一定能辦到、你值得、我支持你的決定等鼓勵。

○觀，見也。則讓我此刻意識到人們在面對時間時，每個人都猶如一位雜技演員，同時運轉著過去拋來的球與未來離手的球，人們想要看見並抵達未來的方法，惟有誠實履行自己當下的承諾，讓自己歷經時間的淬洗與餽贈，而這點或許也就是之前甘師懷真對我叮囑扶犁向前的緣故吧！

甲辰年六月十四 2024.7.19 雨 陳冠傑 mahatun giye 於近代史研究所 謹筆